

# 臺灣的社會地理語言學及其理論\*

洪惟仁

本文主張所謂「地理語言學」應該分為「地理語言學」與「語言地理學」兩個分科，並介紹「社會地理語言學」兩個分科在台灣的萌芽及其理論。首先回顧了臺灣的「社會地理語言學」研究，並提出 8 點檢討。「社會地理語言學」在臺灣誕生雖然只有十年時間，雖然只有六種作品，仍待加強之處甚多，但是充滿創意，前景可待。接著討論「社會語言地理學」的方法，並介紹作者正撰寫中的《臺灣語言地圖集》(*Language Atlas of Taiwan*, 簡稱 *LAT*) 如何將語言社會學的元素融入其語言分類與語言區劃。最後針對 2 點可能的方法論上的質疑，提出辯解。「社會地理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地理學」在臺灣是一門新興的學科，但「社會地理語言學」在日本稱為「社會言語地理學」，已經有半世紀的歷史，文獻汗牛充棟，國人必須急起直追；至於「社會語言地理學」在臺灣雖然還在起步階段，也是值得努力的研究方向。

關鍵詞：地理語言學、社會地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地理學、語言分佈、語言分類、語言區劃、語言地圖

## 1. 前言

如所周知，社會語言學研究語言變異在社會階層上的分佈；地理語言學研究語言變異在地理空間上的分佈，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顯然不同。社會語言學細分為「社會語言學」與「語言社會學」兩個分科，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顯然

---

\* 本文初稿在 2014 年 10 月 25 日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所舉辦的「第十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其中部份內容又曾以〈臺灣社會地理語言學研究的現狀〉(台湾の社会言語地理学的研究の現状) 為題在金澤大學、富山大學聯合舉辦的「東アジア言語地理学国際シンポジウム」(*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ast Asian Geolinguistics*) 宣讀。本文完稿期間承蒙與會學者討論及匿名審查人賜教，受益良多，謹此致謝。又本研究承蒙國科會(今科技部)長期經費補助，在此一併致謝。

不同；「地理語言學」或稱為「語言地理學」，也可以相應地分為「地理語言學」與「語言地理學」。不過學界還沒有正式的分科，雖然學者都知道這兩個分科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顯然不同。

另外，新的地理語言學把社會語言學的元素加入地理語言學，叫做「社會地理語言學」（詳下文 1.3 節）。本文的重點在回顧及檢討近十年來台灣「社會地理語言學」的發展。

### 1.1 「社會語言學」與「語言社會學」

社會語言學研究語言變異在社會階層的分佈，可以分為「社會語言學」與「語言社會學」兩個分科，其主要分別在於研究對象的不同，前者研究的重點在語言形式，即語言變體，後者的重點在分立的語言變種，即把語言或方言看成是自立的存在體進行研究（Chamber and Trudgill 1998）。其研究範疇簡單定義如下：

(1) 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考究語言變異（variation）和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的相關性，語言變體（variants）在社會階層（如職業、性別、年齡等）的分佈及其與社會要因（social variable）的關係。

研究領域：語言形式變異（linguistic variation）。

下位分科：社會方言學（sociodialectology），研究領域限制在方言變異（dialect variation）。

(2) 語言社會學（linguistic sociology）：考究語種（linguistic varieties，指語言或方言）在社會階層的分佈、使用情形及語種之間的互動關係，包括語言使用、語言態度、語言認同等。

研究領域：分立的語種（discrete varieties）。

下位分科：方言社會學（dialect sociology），研究領域限制在方言（dialects）。

(3) 廣義的統稱：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包攝狹義的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和語言社會學（linguistic sociology）兩個分科。

### 1.2 「地理語言學」與「語言地理學」

「地理語言學」（或稱為「語言地理學」）研究語言變異（variation）在地

理空間的分佈。沿襲社會語言學的分科，地理語言學也可以分為「地理語言學」與「語言地理學」兩個分科，其主要分別在於研究對象的不同，前者研究的重點在語言形式，即語言變體，後者的重點在分立的語言變種，即把語言或方言看成是自立的體進行研究（Chamber and Trudgill 1998）。其研究範疇簡單定義如下（Chamber and Trudgill 1998）：

(1) 地理語言學（geolinguistics）：考究語言變體在空間上的分佈及變體的互動關係。

研究領域：語言變體（linguistic variants）。

下位分科：地理方言學（geodialectology），研究領域限制在方言變體（dialect variants）。

研究成果的展現：繪製變體分佈地圖（詞項地圖、特徵地圖）或編成地圖集（linguistic atlas）。

(2) 語言地理學（linguistic geography）：考究語種（linguistic varieties 即語言或方言）在空間上的分佈及語種的互動關係。

研究領域：分立的語種（discrete varieties）。

下位分科：方言地理學（dialect geography），研究領域限制在方言變種的分佈。

研究成果的展現：語種（語言或方言）分佈地圖或地圖集（language atlas）。

(3) 廣義的統稱：地理語言學（geolinguistics）或語言地理學（linguistic geography）。

### 1.3 「社會地理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地理學」

把社會語言學的元素加入地理語言學進行綜合的研究，謂之「社會地理語言學」。在台灣「社會地理語言學」是一個比較新鮮的學科，但在歐美、日本早在 1960 年代就和社會語言學同時發軔，尤其在日本更是蓬勃發展，謂之「社會言語地理學」或「社會方言地理學」<sup>1</sup>。為什麼會產生「社會地理語言學」呢？

<sup>1</sup> グロタース（Willem A. Grottaers、賀登崧）（1969）介紹 1960 年代末期歐美的方言研究，包括社會語言學的新方向，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德國 Marburg 研究中心蒐集德國境內四萬二千個村的語料，其中包括鄉村方言社會影響的詳細調查，當時就已經萌芽了社會地理方言學的新趨

グロタース (Willem A. Grotaers、賀登崧) (1969: 107) 解釋 1960 年代社會方言學在德國、意大利受到特別重視的原因指出：「近代的都市化、產業化社會中，方言漸漸消失，或許使人質問方言研究變得沒有意義。」因而 1960 年代起轉向社會地理方言學的研究，除了地理變異之外也同時調查了社會變異。日本一向注重語言社會學的問題，柳田國男 (1930) 提出「方言周圈論」，主張「新語」由政經中心向周邊擴散，其理論本身就已經注意到新變體擴散的社會因素。但是真正的發軔是 1969 年創發了グロットグラム (glottogram)，這種研究法採取「年齡×地點」的方式，在一條具有方言地理學意義的路線，通常是河流沿岸、鐵路沿線，選定相當密度的方言點，每一個點同時調查不同年齡層的方言變異，製作「詞彙分佈表」<sup>2</sup>。這樣的研究取向雖然脫離了傳統地理語言學的框架，但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得知方言的全貌。這個研究新方向的理論與推動的中心人物是德川宗賢<sup>3</sup>。グロットグラムの研究成果相當可觀 (詳參真田信治 2002)，幾乎是日本地理語言學的主流。

相對於歐美、日本社會地理語言學已經有半個世紀的歷史，台灣的社會地理語言學從 2005 年起步至今才十年，實不能不急起直追。

依照上述「地理語言學」分科的原則，廣義的「社會地理語言學」也可以相應地分為兩個分科，即「社會地理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地理學」。其研究範疇簡單定義如下：

(1) 社會地理語言學 (social geolinguistics or socio-geolinguistics)：將社會語

---

向。日本的「社會方言地理學」發軔於 1969 年國語研究所進行富山縣利賀川流域、新潟縣糸魚川流域的調查，主事者包括賀登崧、德川宗賢、佐藤亮一、本堂寬、高田誠，當時的創意是把年齡變異和地理變異同時進行綜合研究，並採用高田誠的建議，把這種年齡×地點的研究法叫做グロットグラム (glottogram)。我猜グロットグラムの發明可能是受到德國 Marburg 研究中心經驗的啟示。從此以後日本的社會地理方言學蓬勃發展起來，尤其是 1990 年代達到頂峰。真田信治 (2002) 把日本「グロットグラム」的發展史定性為「社會方言地理學的實踐」。

<sup>2</sup> glottogram 的研究實例，可參見本文 2.1.3 節「李仲民的 glottogram 研究」。

<sup>3</sup> 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日本言語地図》(1966-1974) 將性別、年齡、經歷列為各方言點的調查項目，調查場面限定為「日常輕鬆的氣氛下親切的對話」，德川宗賢 (1930-1999) 是主導這個的研究計劃的中心人物 (真田信治 1985: 118)。進一步的理論與調查研究參見真田信治 (1990)、德川宗賢 (1993)。

言學的元素（如語言的年齡變異或其他變因的社會變異）融入地理語言學的研究。如日本的「詞彙分佈表」(glottogram)。

研究領域：語言變體或語言特徵在社會階層和空間上的分佈。

下位分科：社會地理方言學 (social geolinguistic dialectology or socio-geolinguistic dialectology)。

研究目的：了解語言社會變異及空間變異的漸層性分佈 (gradual distribution)，表面時間比較 (apparent time comparison) 或進一步進行真實時間比較 (real time comparison)，見證語言形式演變的過程。

(2) 社會語言地理學 (sociolinguistic geography)：將語言社會學的元素（如語言使用等）融入語言地理學的研究。如本文討論的《臺灣語言地圖集》(Language Atlas of Taiwan，簡稱 LAT)。

研究領域：分立的語種 (discrete varieties) 在社會階層和空間上的分佈。

下位分科：社會方言地理學 (sociolinguistic dialect geography)。

研究目的：了解語種在社會階層和空間上的漸層性分佈 (gradual distribution)，語言接觸產生語種分類上及語種地盤的變化，構建語種分佈史。

(3) 廣義的統稱：社會地理語言學或社會方言地理學。

臺灣的「社會地理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地理學」已經創造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本文將介紹「社會地理語言學」這個新興的研究潮流，並提出方法論上的檢討。

## 2. 臺灣的「社會地理語言學」研究

臺灣已經有幾個作品把社會語言學的因素融入地理方言學，主要是研究年齡變異在地理上的分佈，或根據不同年齡層的變體分佈地圖，進行表面時間的比較，看出變體地理分佈的變化，從而發現語言變化發展的過程。茲分為「社會地理語言學調查研究」及「社會地理語言學的分析研究」兩類分別簡介如下。

### 2.1 社會地理語言學的調查研究

首先介紹 4 篇以呈現社會地理語言學現象為目的的研究。

### 2.1.1 洪惟仁的研究 (2005)

洪惟仁 (2005) 利用中央研究院龔煌城團隊 (1989-1996) 調查戰前出生的以及鍾露昇 (1967) 調查戰後初期出生的變體分佈資料，繪製了 6 個字音 12 張變體地圖，進行了表面時間的比較，發現兩個世代方言地理分佈的變化。6 個字音代表臺灣閩南語 6 個字類的音讀正在進行系統性的變化，其中最受關注的是央元音的崩潰 (包括 ə>e/ue ; i>u/i 等)。

附錄的【圖例 1】是兩個世代「豬」字音變體分佈地圖。由兩張變體分佈圖的比較，可見「豬」變體中，代表泉腔的 *tir*[ti] 變體的分佈地盤在萎縮中。在老年層的左圖中，央元音變體分佈於臺北盆地及新竹、臺中、彰化、雲林的濱海地帶，但在中年層的地圖中，央元音只分佈在臺北盆地邊緣地帶及彰化縣海邊。雖然鍾露昇 (1967) 的調查採方便取樣，因此有些地方缺乏語料，如彰化縣西南部、雲林縣麥寮至今仍有央元音，地圖上沒有顯示，不過央元音的萎縮趨勢已經明顯地顯示出來了。這一篇論文開創了臺灣社會地理方言學的研究。

雖然鍾露昇的調查時間比龔煌城計畫的調查時間早了約 30 年，但因為前者的調查對象是戰後出生的大學生，代表中年層；後者調查的對象選擇戰前出生，代表老年層，可以進行表面時間比較，不過比較的範圍只有兩個年齡層。

### 2.1.2 卜溫仁的研究 (2008)

Brewer (卜溫仁, 2008) 不但是宏觀的臺灣地理方言學研究，同時也是微觀的研究。他的調查人數很多，每個詞的人數不一定，最多的是「鵝」字音，共調查了 1,102 人。調查時間從 1992 到 2006 年之間，對象涵蓋所有的年齡層，受訪人都詳細紀錄其年齡，因之可以進行社會地理語言學的分析。

他將變體和年齡層做了交叉比對，依 5 個年齡層繪製了 5 張變體分佈圖(【圖例 2】〈「鵝」變體年齡分佈地圖〉)，由地圖的比較可見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鵝」字音 *[gr]* 變體的分佈區由南部逐漸向北部及全臺灣擴散，而 *[go]* 的分佈區逐漸縮小 (Brewer 2008: 232-234)。*[o]>[ɔ]* 音變已經受到很多學者的討論，一般方言學家都有這個直覺，但 Brewer 第一次用社會地理方言學方法，清楚地展現了 */o/* 元音展唇化現象在年齡層擴散的過程，使我們管窺臺灣閩南語正在進行中的音變 (*[o]>[ɔ]*)，而且可以推斷臺南地區是 */o/* 元音展唇化音變的擴散源。

這是地理方言學上台灣第二個運用「社會地理方言學」的表面時間比較的研究。

### 2.1.3 李仲民的 glottogram 研究

李仲民是臺灣第一位進行 glottogram 研究的學者，並且可能是日本國外第一位進行這種研究的學者，除博士論文(李仲民 2009)外，新論文多已收入《地理語言學的實踐》(2014)。以下引用他的臺灣西海岸的方言調查(李仲民 2011)中「皮鞋」的「皮」字音的 glottogram 研究為例介紹他的研究。研究區以臺灣西海岸所謂「海口腔」優勢的泉腔區為調查範圍，包括臺中縣 5 點(5-9)、彰化縣 6 點(10-15)、雲林縣 4 點(16-19)，而以苗栗縣 4 點(1-4)為參照組。調查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一 臺灣中部地區西部沿海海口腔 glottogram—「皮」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竹南鎮	後龍鎮	通霄鄉	苑裡鎮	大甲鎮	大安鄉	清水鎮	梧棲鎮	龍井鄉	伸港鄉	線西鄉	鹿港鎮	福興鄉	芳苑鄉	大城鄉	麥寮鄉	臺西鄉	四湖鄉	口湖鄉
1910E							C												
1920E								C		C		C	Ct						
1930E	Ct	J	J	J	Ct	J			J		C			C	J	Ct		J	
1940E							C										Ct		J
1950E	J	J		J		Ct	C	Ct				C			Ct		J		J
1960E			J		Ct				Ct		Ct	C	Ct			J			
1970E		J					C	C	J	Ct	Ct		Ct	C				Ct	
1980E	J		J	J		Ct						J		C	J	J	J		Ct
1990E					J					J		J						J	

資料來源：引自李仲民(2011: 45)，表中代號 C: /pha/ (泉州腔)、Ct: /phe/ (同安腔)、J: /phue/ (漳州腔)。<sup>4</sup>

表中「皮」字的發音，苗栗縣(1-4)顯然以漳州腔佔優勢，其餘是泉州腔的傳統優勢區。但由上表可知，整體的分佈大勢是漳音(phue)包圍新泉音(phe)，

<sup>4</sup> 原表中每一個方言點只有三四筆語料，網底方言代表色為洪惟仁加工。資料空缺的格子依方言分佈連續性趨勢推斷其方言屬性，無法推斷的格子留白。

原文定性為同安音)，<sup>5</sup>新泉音包圍老泉音 (**phə**) (原文謂之「泉州腔」)。李仲民 (2011: 45) 推斷說：「……此區「皮~鞋」的韻母，正在進行 ə>e>ue 的變化」。從年齡層觀察其分佈趨勢，泉腔區從中年層開始顯現了新泉音逐漸取代老泉音的趨勢；1980 年代開始，漳音又開始凌駕泉音 (老泉音與新泉音)，尤其是雲林縣 (16-19) 的泉腔方言受到漳腔影響的程度，遠比彰化縣、臺中縣嚴重。

依筆者的看法，上表中的新泉音 **phe** 是由老泉音的 **phə** 變化而來。新泉音分佈於漳音和老泉音之間，我們認為這樣的分佈格局暗示著泉腔方言的「去央元音化」(**phə**>**phe**) 可能是受到漳腔方言接觸催化的音變。也就是說，泉腔方言有標的央元音，因為受到漳腔方言的影響觸發了「去央元音化」音變 (詳參洪惟仁 2003)。但是 1980 年代以後進一步發生 **phe**>**phue** 的音變，不是自然的音變，顯然是全面向漳腔靠攏了。

另外，李仲民改進 **glottogram** 的線性結構，創發了所謂「三維立體 **glottogram**」，即將 **lottogram** 二度空間加上社會變異，構成三維立體圖。不過這種「三維立體 **glottogram**」仍不能說是地圖。他在博士論文 (2009: 204) 繪製了一張「臺灣東北部程度副詞/tsin<sup>44</sup>/ (真)、/tsin<sup>41</sup>/ (盡) 三維圖表」(參見【圖例 3】「臺灣東北部程度副詞傳統形式 tsin<sup>41</sup> 分佈圖」)，雖原題為「三維圖表」，其實是地圖。地圖顯示東北部老漳腔區傳統的程度副詞/tsin<sup>41</sup>/正在向普通腔的 /tsin<sup>44</sup>/靠攏的趨勢。漳腔區北部周邊已經完全變化了，過渡區的青年層也變化了，只有中央區老、青都還保存著舊音。這是一個舊形式/tsin<sup>41</sup>/正在萎縮，被周邊的新音包圍的「晚期」發展類型 (參洪惟仁 (2015))。此圖因為套疊了二度空間地圖而加上時間的因素，是略過三度空間、虛擬四度空間的「立體地圖」，

<sup>5</sup> 本文把李仲民 (2011) 所謂的「同安腔」改稱「新泉音」；而所謂的「泉州腔」稱為「老泉音」。所謂「腔」指方言變種而言，「泉腔」方言有很多種，西部海岸的「老泉中腔」有央元音，「新泉中腔」和「泉海腔」沒有；「同安腔」也有新派、老派之分，「老同安腔」有央元音，「新同安腔」無央元音。泉腔方言央元音變成非央元音是普遍的趨勢，不限於什麼「腔」。可見用帶地名的「腔」為變體類型命名不適當。我們認為研究音變最好就變體的類型來討論，這是本文不採用「腔」的原因。我們把央元音變體 ə 稱為「老泉音」，非央元音變體 e 稱為「新泉音」，合口的 ue 稱為「漳音」。



可以說是台灣社會地理方言學四度空間「立體地圖」的濫觴。<sup>6</sup>

#### 2.1.4 何正芳的湖西方言研究

何正芳（2011）就澎湖縣湖西鄉方言三個主要特色進行了社會地理方言學研究。這篇論文所以值得重視是她繪製了4張立體的「社會地理方言分佈地圖」。本研究把年齡層分為四層，每一個年齡層至少一個發音人，就各個字類，統計調查所得各村、各字音、各變體出現的數字，製成表格。每一個年齡層都有語料，並未出現空缺；她又將統計的變體反映的數字指數化，分為5階，表示保存傳統音讀的程度。又每一個村都有語料，在二度空間的地圖上加上年齡的變異，雖然略過三度空間的表現，可以說是四度空間的立體地圖，比 glottogram 的線性分佈調查，只表現一度空間，略過二、三度空間的表現，不繪製地圖的作法，更加合乎地理方言學正規的研究。

湖西方言最有名的特色是閩南語〈高沽〉字類（約當中古遇開一，共同閩南語擬為\*ou）的音讀。這個字類泉腔方言音 oo[o]；漳腔方言大部份唸 oo，周邊方言唸 ou；最有特色的是漳州長泰方言唸 eu；而湖西方言唸 io，如「天烏烏（io）、卜（boh）落雨（hiō）……」。「烏」字臺灣的漳、泉方言普遍唸 oo，澎湖馬公方言傾向於變成 o（oo=o 混同，標為/o/）；「雨」臺灣的漳、泉方言普遍唸 hōo，澎湖馬公方言傾向於變成 hō，而湖西方言唸成 hiō，湖西方言的 io 音讀是它獨一無二的特色。

澎湖縣政府所在地馬公的方言在澎湖縣具有相當高的聲望，湖西方言在馬公方言的影響下，正在向馬公靠攏。何正芳對湖西鄉各村、四個年齡層，各調查 39 個字，統計保存湖西方言傳統 io 讀的字數，並加以指數化、分成 5 階，每階各以一個符號表示，繪製成【圖例 4】「澎湖縣湖西鄉傳統 io 讀社會地理方言分佈圖」。

地圖清楚地顯示：(1)〈高沽〉類 io 音讀分佈在湖西鄉各村，但各村都正

<sup>6</sup> 有關空間的維度須要略作說明。點是零度空間、線是一度空間、面是二度空間、體是三度空間，加上時間就構成四度空間。一般的平面圖都是二度空間，利用空間表現其他維度的空間都是虛擬的。比如地圖上的點或線都是二度空間的點或線，等高線三度空間的地形。所謂「四度空間的立體地圖」也是以二度空間地圖虛擬四度空間的表現法。

在進行著 io>o 的音變；(2) 隨著年齡的下降保守度逐漸降低，其保守度平均：老 57.1%、中 26.9%、青 11.9%、少 3.11%。高保守度的紅色●符號集中分佈在最下層的老年層，到了少年層幾乎快完成 io>o 音變，完全向馬公靠攏了；(3) 就地理分佈而言，以湖西機場為界，較保守的方言都分佈在東區和南區，西區幾乎都是輕度保守方言。紅色●符號集中在東區，可見東區比南區保守。

顧百里 (Cornelius C. Kubler) (1978) 是第一部澎湖縣地理方言學的碩士論文，同時也是第一部臺灣區域地理方言學的作品。他的調查因為發音人大部份是小學生，沒有呈現澎湖縣更保守的方言分佈狀態。不過他已經發現湖西鄉〈高沽〉字類唸 io 的特色正在萎縮，強勢的馬公腔-o 正急遽向東擴散，湖西西邊離馬公最近的地方已經沒有人唸-io (按：依據何正芳 (2011)，其實還存在，只是比較少)，往東大人唸-io，小孩唸-oo，更往東，小孩時而說-oo，時而說-io，到最東邊靠近大海的地方，連小孩都只說-io 不說-oo。這是很精彩的社會地理方言學的描寫。作者說他「希望幾十年後……有機會再到澎湖去調查，將本文中所寫的和以後的方言情況做一比較。這樣也許能對語言演變的性質有所了解。」(顧百里 1978: 113)，只可惜他本人沒有繼續做這種社會地理方言學的研究，何正芳 (2011) 正好滿足了他的願望。不過從何正芳 (2011) 的調查看來，東部的少年層也呈現低保守度 (■表示的 1~9)，每一個村高保守度 (●表示的 30~39) 都分佈在老年層。雖然我們無法根據兩個調查進行正規的「真實時間的比較」(real time comparison)，但是也可窺見 30 年來湖西方言確實已經進行了 io>o 的音變。

陳昭蓉碩士論文 (2005) 做了社會方言學研究，也證明了湖西方言的-io 正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逐漸變成 -o，到少年層幾乎全部變成 -o 了。她的調查分四個年齡層、男女性，每一個 cell 各調查一人，湖西鄉 22 個村，每村調查 8 人，全鄉有效調查人數 168 人。她繪製了一張-io 變體分佈圖(陳昭蓉 2005: 55)，-io 變體成連續性分佈於東半部 15 村。可惜陳昭蓉 (2005) 的研究取向是社會方言學的，沒有進一步進行社會地理方言學的研究，或繪製 -io 變體漸層分佈圖或方言等高線。

何正芳 (2011) 彌補了顧百里 (1978) 地理方言學研究和陳昭蓉 (2005)

社會方言學研究的缺口，整合成一個社會地理方言學的研究。

## 2.2 社會地理語言學的分析研究

本節介紹兩個以語言現象的分析與解釋為目的的研究。其方法是分別進行獨立而完整的社會語言學和地理語言學調查，然後再根據主題需要，分別從兩個領域的研究成果中選擇部分材料，特別是將年齡的變異融入地理語言學研究中，進行分析，提出解釋。此種研究方法因為社會語言學和地理語言學兩方面都做完整的調查，需要付出更多時間與人力，難度較高，因此作品較少。以下介紹兩個研究。

### 2.2.1 簡秀梅關廟方言「出歸時」回頭演變研究

簡秀梅（2006）針對「出歸時」字類同時進行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調查研究的作品。地理方言學調查方面，她根據關廟方言「出歸時」現象（tsh>s）的地理分佈，繪製了s變體的「方言等高線」【圖例7】，呈現方言的漸層分佈。另外選擇了關廟、歸仁、茄苳三個代表點進行社會方言調查，結果發現所有的地方都顯示相同的音變趨勢，即隨著年齡的下降，tsh變體越來越多，s變體逐漸衰退，顯示這個方言正在進行著s>tsh的音變。

連結歷史上曾經發生的「出歸時」音變（tsh>s），關廟方言剛好進行了一場tsh>s>tsh的「回頭演變」（retrogressive change）。回頭演變只有方言接觸才可能發生（洪惟仁 2003: 212-213，簡秀梅與洪惟仁 2008: 46）。

這個研究不但進行了表面時間的比較，並進一步與陳淑娟（1995）的調查結果進行了「真實時間的比較」。其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二 關廟鄉 tsh-變體回升速度真實時間比較表

ts <sup>h</sup> -	老年層	中年層	青年層
陳淑娟（1995）	20%	32%	97.5%
簡秀梅（2005）	40.37%	77.62 %	100 %

兩次調查都顯示關廟方言傳統的s音讀隨著年齡的下降急速地向普通腔的tsh音讀靠攏；陳淑娟（1995）的老年層還有8成保存傳統的s音讀，只有2成

向普通靠攏，到了簡秀梅（2005）只剩不到 6 成保存傳統的 s 音讀，4 成向普通靠攏；陳淑娟（1995）的少年層還殘存 2.5% 的 s，到簡秀梅（2005）全部變成 tsh。這是難得的「真實時間的比較」，證明了關廟方言的「回頭演變」是確實在進行中的音變。

簡秀梅（2006）的社會地理方言學研究呈現「出歸時」現象在地理方言上和社會方言上的漸層分佈狀態是互相呼應的。社會方言的研究所看到的「回頭演變」，顯示關廟的 s 是一個弱勢的變體，正在向周邊的 tsh 變體靠攏；印證了在關廟的 s 是被周邊的 tsh 變體所包抄的萎縮性變體，在語言分佈的發展史上屬於「晚期」階段：舊語被新語包抄，舊語殘存於孤立區（詳參洪惟仁 2015）。

### 2.2.2 洪惟仁入字頭音變潮流研究

洪惟仁將其在全臺灣及閩南地區所蒐集的地理方言學調查語料<sup>7</sup>，與其全臺灣的社會方言學研究結果（洪惟仁 2003），整合起來進行了「社會地理語言學」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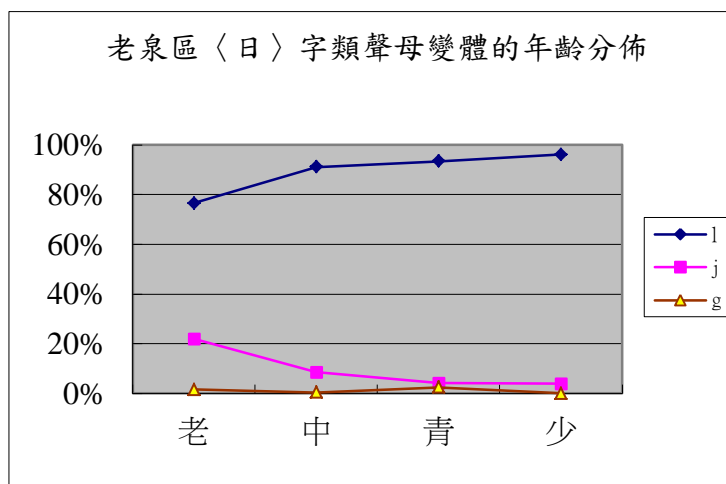
洪惟仁（2013b）是一個典型的「社會地理語言學」的研究例。論文以兩岸〈入〉字頭變體分佈圖，比較福建南部大閩南語地區及臺灣地區〈入〉字頭變體的分佈，發現 j->l 音變是泉腔方言的趨勢。地圖呈現 l 變體在原鄉閩南地區分佈得很廣，除了絕大部分的泉腔方言區，連龍岩區、漳東區都已經受到擴散；相對的在臺灣主要分佈於泉中區和泉海區，同安腔及安溪腔（泉山腔）和漳腔區基本上還保存 j 讀。兩岸閩南語 l 變體的分佈範圍並不吻合，顯示大陸閩南地區的 j->l 音變擴散的速度比較快，而臺灣相對落後。

論文引用洪惟仁（2003）的社會方言調查，證明近年來臺灣正在進行著 j->l 音變，不僅泉腔區，連漳腔區都在急速變化中，向閩南急起直追。社會地理方言學研究推論「入歸柳」（即 j->l 音變）是整個閩南語的音變潮流（drift），不過在臺灣，j->l 音變顯然是戰後才開始由泉海、泉中腔區向全島擴散。

〈入〉字頭變體齊齒音和合口音有不同的音變速度，謂之「結構擴散」（詳

<sup>7</sup> 按「全臺灣的」指龔煌城於 1989-1997 之間主持的國科會「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所蒐集的語料，「閩南地區的」指洪惟仁在 2010-2015 之間主持的國科會「《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之寫作計畫」之類的計劃所蒐集的語料。兩個計劃均未正式發表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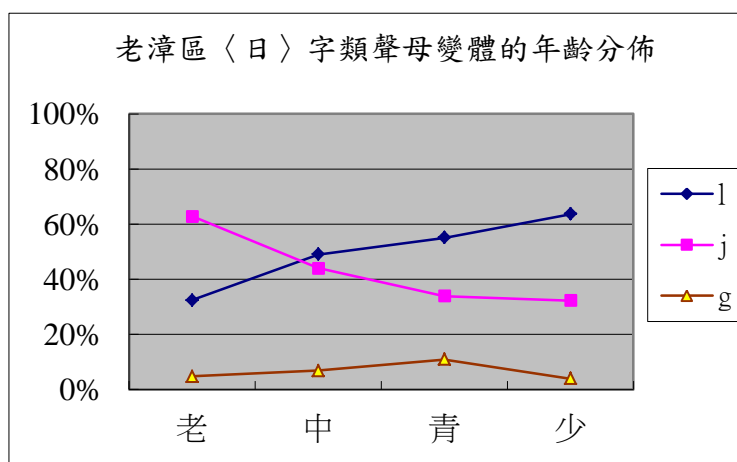
參洪惟仁 2003)。以下是齊齒呼〈日〉類聲母的社會方言。先看老泉區的變化：



圖一 老泉區〈日〉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老泉區的老年層有 76.5% 唸成 l，而唸 l 的比例隨著年齡逐年昇高，到少年層已經昇高到 96.1%，幾乎完成了「入歸柳」的音變了。

至於老漳區的調查結果，如下圖所示：



圖二 老漳區〈日〉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上圖顯示，傳統變體 j- 在老年層的佔有率雖然接近三分之二（62.8%），

但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逐漸衰退，到少年層只剩下三分之一不到（32.3%）的佔有率；相對的，l-變體在老年層雖然只佔不過三分之一（32.4%）的佔有率，但是隨著年齡層的下降逐漸上升，到少年層更達三分之二（63.7%）的佔有率，兩者的消長正好成了 X 狀交叉變化，交叉點在中年層，也就是說，到了中年層 j-和 l-已經平分秋色，到了青少年，j-變體就節節敗退，趨於沒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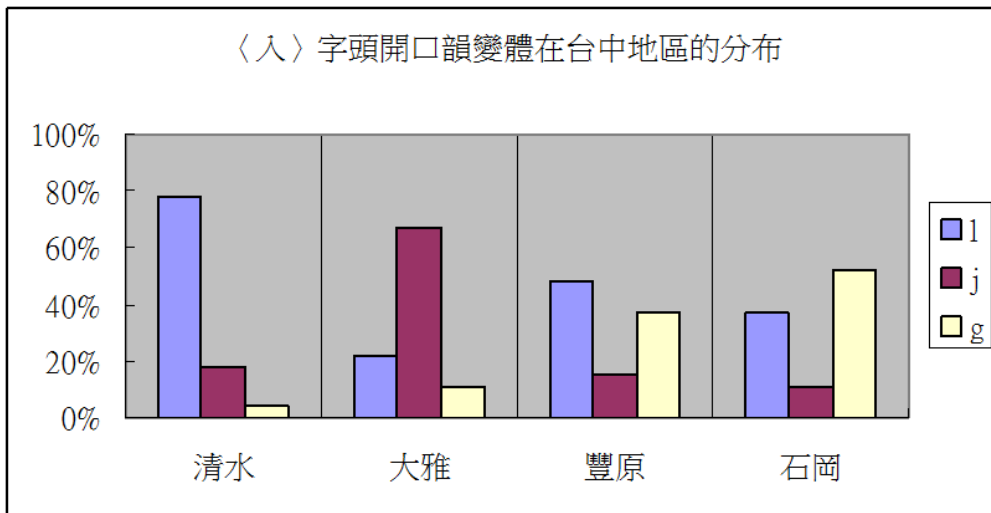
由上可見，雖然老漳腔 j-變體極佔優勢，和地理方言分佈的優勢一致，可是在社會方言上卻顯現完全不同的局勢。無論漳泉，老變體 j-在年齡層的分佈都一路下滑，而新泉音 l-變體則都一路攀升，顯示著台灣的老泉區和老漳區平行地正在進行著「入歸柳」（j→l）的音變，而漳腔區急起直追泉腔區。

至於新漳音 g-變體的使用率微不足道，雖然在老漳區的中、青年層稍有起色，卻立即被新泉音 l-壓倒，完全沒有競爭力可言。他發現臺灣另外有一股音變支流 j>g，分佈在「鶴佬客」分佈區及其周邊，他論證這是受到客語底層影響的結果。

表三 〈入〉字頭日字類聲母變體在台中地區的分布

	清水		大雅		豐原		石岡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21	78%	6	22%	13	48%	10	37%
j	5	18%	18	67%	4	15%	3	11%
g	1	4%	3	11%	10	37%	14	52%
合計	27	100%	27	100%	27	100%	27	100%

製成直條圖如下：



圖三 〈入〉字頭日字類聲母變體在台中的分佈

由兩個極端的方言區的社會方言調查數據可以看出，台灣閩南語不論漳泉，共同的趨勢是「入歸柳」。可以預測將來的台灣話聲母清單中，〈入〉字頭可能會消失，十五音變成十四音。這就是整個閩南語的音變潮流。只是這個潮流，大陸閩南語區發展的速度遠在台灣之前，台灣正在急起直追。

他根據 200 多年前的《彙音妙悟》(1800) 年〈入〉(\*j)、〈柳〉(\*l) 聲母的紀錄，顯示當時作者的南安方言 j~l 兩套聲母是對立的，顯示 j->l 音變還沒有擴散到南安。因此推斷 l 變體是由泉海腔區開始擴散，但 200 年以前只限於晉江東岸，還沒有擴散過晉江西岸。這個研究是把社會地理語言學運用到歷史語言學，可以算是一種社會「社會地理歷史語言學」的研究。

文末討論「方言競爭與融合的機制」，歸納出 5 個決定方言音韻發展的因素：人口效應（也可以稱為原鄉語言傳承效應）、有標性效應、結構完整性效應、客語底層效應、語言接觸效應等以解析臺灣入字頭音變的機制。

## 2.3 台灣社會地理語言學研究的成果與檢討

### 2.3.1 台灣社會地理語言學的研究成果

社會語言學和地理語言學本來是各自獨立而不相干的研究領域，把社會語言學的元素融入地理語言學研究，就可以說是「社會地理語言學」。本文採用「地

理語言學」與「語言地理學」分科的主張，因此「社會地理語言學」可以細分為「社會地理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地理學」兩個分科。

以上第二節評介臺灣的社會地理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分為社會地理語言學現象呈現及社會地理語言學分析研究兩類簡介其研究成果。前者以呈現社會地理語言學現象為目的，一開始就把社會語言學的元素（特別是年齡層因素）融入地理語言學研究中。後者以解釋社會地理語言學現象為目的，社會語言學和地理語言學先分別進行，各自進行獨立而完整的調查，然後再根據主題需要，剪裁語料，進行分析以解釋。

### 2.3.2 台灣社會地理語言學方法論的檢討

臺灣的社會地理方言學正在起步，從洪惟仁（2005）算起，至今不過 10 年的研究史，所有作品都在嘗試階段，其研究方法可能存在著一些值得檢討的問題：

- (1) 除了李仲民（2011）、何正芳（2011）是有計劃的研究，洪惟仁（2005）和 Brewer（2008）是大型研究的副產品，摘取部分語料進行比較。但因一開始就把社會語言學的元素（年齡層變異）摻入地理方言學研究，因此能夠進行社會地理方言學的研究。
- (2) 前 3 篇共同的問題是資料缺漏或不均衡分佈。比如洪惟仁（2005）只提供兩個年齡層的比較；Brewer（2008）分為五個年齡層，但資料集中在中、老年層，青少年層的資料少得多，語料分佈密度不均衡，無法呈現臺灣閩南語進行中的[o] > [ɤ]音變完整的面貌。李仲民（2011）設定了九個年齡層，但每一個方言點祇有 3~4 個發音人語料，其餘保留空缺。祇有何正芳（2011）沒有空缺。
- (3) 前四篇的調查方法是傳統方言學的，通常一個方言點的受訪者只有一個人，但一個人是否可以代表整個社區？或一個年齡層？如果受訪人數太少，年齡層分得太細而沒有指數化處理，往往會出現不平滑的曲線，這顯示社會地理方言學研究採取傳統方言學調查的缺點。後兩篇簡秀梅（2006）及洪惟仁（2013b）因為採取正規的社會語言學調查，受訪者人數夠多，社會階層篩選嚴格，可以避免變體分佈曲線不平滑



的缺點。

- (4) 洪惟仁 (2005) 和 Brewer (2008) 的地圖是面的呈現，以多張平面地圖呈現變體在不同年齡層的地理分佈的變化。簡秀梅 (2006) 的「方言等高線」可以說是「三度空間」地圖。李仲民 (2009: 204) 的「三維圖表」已經具備了四度空間立體地圖的雛型。何正芳 (2011) 將社會方言變異和地理方言變異呈現在同一張地圖上，繪製了 4 張四度空間的立體地圖。
- (5) 目前所謂「社會地理語言學」的研究都只將「年齡」的元素融入地理語言學中，進行表面時間的比較，還沒有見到將其他元素如職業、性別等融入研究的嘗試。
- (6) 前四篇論文以呈現社會地理語言學現象為主要目的，但其研究成果可以引出許多問題，如漳泉方言競爭結果，為什麼有些變體會勝出，有些變體競爭失敗而萎縮？為什麼雲林縣的泉腔方言受到漳腔影響的程度，遠比彰化縣、臺中縣嚴重？這些都可以從語言的普遍性或語言地理環境的空間結構尋求解釋，值得繼續進一步研究。
- (7) 簡秀梅 (2006) 和洪惟仁 (2013b) 兩篇論文是各就社會語言學與地理語言學進行正規而完整的研究，然後將研究結果結合起來進行社會地理方言學研究，達成柴田所說的「將地理語言學做為語言史的方法之一」(柴田武 1969) 我們願意將這樣的研究叫做「社會地理歷史語言學」。

臺灣的「社會地理語言學」研究還在起步嘗試，但其研究成果已經呈現了進行中的變化，展現了令人驚艷的研究成果，是很好的開始。

### 3. 臺灣的「社會語言地理學」研究

「語言分類」與「語言區劃」是「語言地理學」兩個重要的課題。而「社會語言地理學」兩個重要的課題，一是如何把社會語言學元素融入「語言分類」中；一是如何把社會語言學元素融入「語言區劃」中。台灣的「社會語言地理學」唯一的研究例是洪惟仁 (2017) 的《台灣語言地圖集》(LAT)，因此本節

以 *LAT* 為例，討論如何將社會語言學的元素融入語種分類與語言區劃的方法。

### 3.1 語言分類的社會語言學元素

「社會語言地理學」是將語言社會學的元素（如語言使用）融入語言地理學的研究。這個研究之成立有兩個先決條件：

(1) 把每一個語種看成是分立的存在體

這是語言社會學和語言地理學的基本認識。在這個認識下，研究的對象不再是「語言變體」，而轉為「語言變種」，地圖上看不見語言變體的分佈。

(2) 建立語言分類的標準，確定語種分類系統

語種分類是語言社會學和語言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條件，分類之後，才能確定研究主體（語種）的存在及其定位。

分類層次要恰到好處，類別不能太粗，也不能太細。如果要細分的話，每一個人的語言（即「個人方言」*idiolect*）都是不同的，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個人方言。做為語言社會學或地理語言學的研究對象，繁雜、瑣碎的個人語言必須經過「適當的」分類，細到什麼層次要視研究的目的與需要。因此「建立語言分類的標準，確定語種的分類系統」是進行「社會語言地理學」研究的前提。

方言自然演變、方言分化，以及方言變化速度的參差產生方言意涵性關係可以歸入傳統歷史語言學、類型方言學的研究領域；但方言分化在地理上呈現的漸層變化及漸層分佈與語言接觸有關，屬於社會語言學或語言社會學研究的課題。把語言接觸所產生的方言漸層變化與漸層分佈融合到語種分類系統，進一步作為語言地理區劃的根據，這就是我把 *LAT* 定性為「社會語言地理學」研究的理由。

本節以臺灣閩南語方言為例，說明方言漸層性分佈的研究如何反映在 *LAT* 的方言分類上。

#### 3.1.1 方言接觸與方言漸層分佈

由實際的操作中，我們發現方言漸層變化與漸層分佈是平行的，這個平行現象正好體現了「方言接觸效應」。語種分化的原因不外語言自然演變和語言接

觸，語言自然演變有時也是語言接觸觸發的結果，因此語言分類不能不同時考慮語言接觸的影響。

語言接觸效應反映在語言地理分佈，呈現的是方言變種的漸層分佈現象。洪惟仁（2009）提出「爐心」的概念，該文指出：「安溪腔（即泉山腔）、同安腔、漳州腔三個方言在（台北）盆地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面，而其交界的板橋和大稻埕附近就是清代分類械鬥最嚴重的地帶，同時也是方言接觸的前線，方言融合的『爐心』。」也就是說，越遠離方言交界線、遠離方言融合的「爐心」，越能保存「純粹」的方言成份。

【圖例 6】「臺北地區閩南語分區圖」顯示兩個爐心就是「新方言」（不論漳、泉）的分佈區，也就是方言融合最厲害的地方，而「老方言」分佈在周邊，越遠離爐心的方言越能保存方言（不論是泉腔或漳腔）的「純粹性」。這個分佈型態的案例合乎「方言周圈論」（柳田國男 1930）或「周邊分佈原則」（柴田武 1969）的預測：「古語分佈於周邊」。

但「老方言」不一定都分佈在周邊。張素蓉（2006）的臺中海線泉腔分佈圖和簡秀梅（2006）的關廟「出歸時」分佈圖（【圖例 7】「閩南語方言變體分佈的「方言等高線」地圖」以及前述李仲民（2011）臺灣西海岸的 Glottogram 研究（參 2.1.3 節）都顯示，最保守的變體，如老泉音的「央元音」，關廟的「出歸時」老關廟音 s 都分佈在中央，反而新的變體卻分佈在周邊。我把張素蓉（2006）及簡秀梅（2006）所繪製的地圖並列，作為「方言等高線圖」的例子。這兩張地圖能夠顯示方言的漸層分佈，同時也顯示方言的漸層變化，是三度空間立體地圖的濫觴。張素蓉（2006）呈現的臺中海線泉腔央元音的漸層分佈，簡秀梅（2006）的關廟「出歸時」分佈圖呈現關廟的 s-變體位在中心地帶。我們認為這些中心地帶的方言特徵都是屬於競爭失敗的、萎縮中的老變體，被臺灣普通腔新變體擴散的洪水「包抄」所殘留的舊語孤立區（洪惟仁 2015）。我把這個中心地帶叫做「高峰」地帶（張素蓉與洪惟仁 2007: 27）。

怎麼知道中間的變體是舊語而不是新語呢？這一方面可以根據整個臺灣閩南語的音變潮流判斷，比如「央元音崩潰」，這是整個閩南語的音變潮流，臺灣泉腔區鄰近漳腔區的交界地帶，因為方言接觸的觸發，變化得更快，音變方向

也很一致（詳參洪惟仁 2003）。

更重要的是社會語言學調查的證據。有關關廟方言的「出歸時」現象，陳淑娟（1995）和簡秀梅（2006）都做過社會方言調查，兩次調查都顯示傳統的 -s 音讀紛紛向普通腔靠攏，表現出「回頭演變」的音變過程（tsh>s>tsh）（洪惟仁與簡秀梅 2007，詳參本文 2.2.1 節）。證明了關廟方言中央地帶的「高峰」保存著「舊語」s 變體，而被分佈在周邊普通腔的「新語」tsh 變體所包抄。

以上所揭示的兩種不連續性 a-b-a 分佈，代表語言分佈發展的兩個類型，前者是「插入型」，後者是「包抄型」。這兩個類型，新語與舊語的分佈型態正好相反，「插入型」的新語（新形式或新方言）分佈在「爐心」位置，舊語（新舊形式或舊方言）分佈在周邊；「包抄型」是新語擴散到晚期，舊語被新語包抄，舊形式或舊方言殘存於中心的「高峰」（詳參洪惟仁 2015 的分析）。

無論是「插入型」或「包抄型」，「高峰」的周邊地帶及「爐心」都是語言接觸的前鋒地帶，也就是前進方言、新語或新方言的分佈地帶。台灣的「新方言」都是方言接觸的產物。其實就整個閩南語區而言，台灣閩南語都是新方言，臺灣閩南語是漳、泉方言的混雜，沒有所謂「純泉腔」或「純漳腔」的方言。但每一個地區混雜的配方不同，保守和前進的程度不同，因而產生各種大同小異的方言。如果我們排除了方言接觸，台灣的閩南語將無法分類。語言接觸是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課題，這就是說，如果我們不是站在「社會地理方言學」的立場，台灣閩南語將不知怎麼分類。

這種情形在客語方言的分類也相當類似，台灣的客語方言沒有一個是純原鄉方言的移植，都是混合腔；南島語的情形比較單純，自然分化的情形較多，但在東部，語言接觸產生的新方言不少，譬如所謂「東賽德克」、阿美語中部方言，語言接觸產生的新方言往往造成分類上的困擾與爭議。*LAT* 不但把上述的理念，運用到所有閩南語，也運用到客語、南島語的次方言分類，全面地將臺灣所有語言、方言精細地分類。

### 3.1.2 *LAT* 兼顧縱向分化與橫向接觸的分類系統

*LAT* 以方言縱向分化為劃分階層分類中上層大分類的主要基準，並參酌語言接觸產生的變化，作為下層小分類，即次方言、二次方言分類的基準。各個

音變方向不同的方言之下根據方言特徵褪色程度的不同，分為老、新方言，如漳腔有老漳腔、新漳腔之分；泉山腔有老泉山腔，新泉山腔之分；同安腔有老同安腔、新同安腔之分等……，還保存某些區別性特徵可以辨別是泉腔方言的還有「偏泉腔」。漳、泉混合程度太高，無法歸類為漳腔或泉腔的，歸為「混合腔」<sup>8</sup>。「新方言」和「混合方言」都是語言接觸的產物。

臺灣閩南語的方言分類系統，洪惟仁(1992)建立了基礎，經過潘科元(1996)、洪惟仁(2009)、涂文欽(2009, 2011)的實踐與改進，至LAT已經完成了相當精密的系統。下表是LAT歸納的臺灣閩南語分類系統：

表四 臺灣閩南語分類系統

方言	次方言	二次方言
漳系方言	老漳海腔	普通老漳海腔
		礁溪老漳海腔
	新漳海腔	普通新漳海腔
		南投新漳海腔
		名間新漳海腔
		鶴佬客漳腔
	漳山腔	
	粵漳腔	老粵漳腔
		永靖新粵漳山腔
		員林新粵漳海腔
		大村偏粵漳海腔

<sup>8</sup> 所謂「混合腔」(hybrid accent)是站在方言分類的立場，統稱混合程度嚴重，無法歸入漳腔或泉腔的一類閩南語方言，但沒有規定其形式內容。所以同為混合腔，高屏地區和臺南就不一樣，〈箱薑白〉字類高屏方言唸成-iü，臺南方言唸成-iö；關廟方言又不一樣，有「出歸時」的特色（把普通腔的 tsh- 唸成 s-）。洪惟仁(2003)又提出「普通腔」(General Taiwanese)的概念，這是指一種在地理方言或社會方言上普遍分佈的變體。根據我們的台灣社會方言學研究，臺灣閩南語的確已經浮現了一種「普通腔」，所有的臺灣閩南語方言都顯示了向普通腔靠攏的趨勢，形成台灣閩南語的音變潮流。「台灣普通腔」雖然也是一種「混合腔」，但他指的是一種已經成形，且正在普遍化的趨勢，但「混合腔」指以南閩州為主的一類混合方言。

泉系方言	泉山腔	老泉山腔
		南甯老泉山腔
		新泉山腔
	泉中腔	老泉中腔
		新泉中腔
	泉海腔	老泉海腔
		新泉海腔
	同安腔	老同安腔
		新同安腔
		竹篙灣老同安腔
		澎湖新同安腔
	偏泉腔	湖西新同安腔
		普通偏泉腔
		白沙屯腔
混合方言	普通混合腔	大林蒲腔
	臺南混合腔	普通偏泉腔
		白沙屯腔
	關廟混合腔	泉味腔
		漳味腔
	平埔腔	關廟漳味腔
		關廟泉味腔
西拉亞平埔腔		
阿美平埔腔		
	埔里平埔腔	
	道卡斯平埔腔	

資料來源：引自洪惟仁《臺灣語言地圖集》(2016)【附錄 2】「臺灣語種分類系統表」<sup>9</sup>

這是一種階層性的分類系統。重點是將方言接觸所產生的方言融合現象列入方言或次方言、二次方言的分類基準，因而次方言、二次方言都有「老」、「新」或「偏」之分，混合腔方言也因為混合配方的差異而有不同的次方言分類。

語言的自然分化比較有規律，也具有系統性，因此一般的語言分類都以方

<sup>9</sup> 上表中格子內的底色為 *LAT* 地圖上的語種代表色。白底表示格子內的語種在地圖上不佔有特定空間，只以「語言點」的形式存在於某個語言小片內。

言自然分化為主要依據。但語言自然演變有時也會受到語言接觸的催化而加速演變，不完全是語言移借的結果。

台灣閩南語方言，通常主要成份傳承自原鄉方言（包括古音殘留、或特殊方言口音），新的自然演變通常只限於表面的語音現象，音韻上以及詞彙或語法的變化通常是方言接觸的結果。但接觸演變也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催化音變」，一種是「移借音變」。

所謂「催化音變」指一種在閩南語進行中的音變潮流，有些保守方言變得慢，有些前進方言變得快。方言接觸可能催化方言潛在的音變動機，使之加速變化，如閩南語本來就潛著「央元音的崩潰」(\*ə>e; \*i>i)的音變動機，早在台灣人唐山過台灣之前，泉州濱海地帶已經發生了這個音變，產生所謂的「泉海腔」，台灣北港、香山就是傳承了原鄉「泉海腔」的特色；又如漳浦、海澄等「漳海腔」的「鼻化元音上昇」音變(\*iō>iū)是受到泉腔方言影響的「催化音變」產生的「新漳音」。「泉海腔」是一種「新泉音」，「漳海腔」是「新漳音」，兩者都分佈在漳、泉容易接觸的濱海地帶。台灣大部份的「新泉音」都發生在泉、漳交界地帶，顯然是因為和漳腔方言接觸，而被催化的結果。

方言接觸再深入，可能把接觸方言的音韻系統整套搬過來，就是「移借音變」。《彙音妙悟》〈科〉字母泉腔方言唸-ə，漳腔分為兩類，〈科伽〉類字唸成 e，〈科檜〉類字唸成 ue。台灣的新泉腔除了發生\*ə>e的自然音變，還可能發生\*ə>ue的音變。如果一律唸成-e，就可判斷是「催化音變」，如果隨著漳腔分為兩類，〈科伽〉類字唸成 e，〈科檜〉類字唸成 ue，這是不自然的音變，顯然是「移借音變」。又如《彙音妙悟》〈居〉韻類(\*ir)漳腔分為兩類，〈居居〉（遇開三）唸成 i、〈居艭文〉（止開三）唸成>u。按照泉海腔「央元音的崩潰」規律，泉腔方言的自然演變應該所有〈居〉韻字都要唸成 i(\*ir>i)，但台灣的「新泉腔」的〈居〉韻字往往隨著漳腔的分韻方式分化為兩個字類(\*i>i或\*i>u)，顯然是「移借音變」；關廟方言出歸時的「回頭演變」(\*tsh>s>tsh)更是典型的「移借音變」。本來(\*tsh>s)音變已經合併的 s，又照普通腔分為兩類了，這種現象從歷史語言學的觀點來看，除非是語言接觸，自然音變不可能發生（洪惟仁與簡秀梅 2012），因此這類音變屬於「移借音變」。

台灣有些閩南語新方言如閩南語混合腔，完全是語言接觸所產生的，鶴佬客漳腔（如豐原漳海腔閩南語）是客語的底層影響；西拉亞平埔腔、阿美平埔腔、埔里平埔腔、道卡斯平埔腔是平埔族語言的底層影響，還有南島語和日語接觸產生的「日語客里謳」（*Japanese-based creole*），這些「新語言」和「新方言」有些可以自成一類語言（如日語客里謳），或歸入某個大類方言之中（如閩南語混合腔），但比較零散的小方言，只能納入次方言或二次方言的系統中。

*LAT* 語種分類的主軸是根據方言分化的系統性原則，所以大分類名稱多根據原鄉方言分類，但語言接觸所產生的新方言，具有特殊變體配方，只好用台灣地名或底層語言來命名。

以上以閩南語為例說明 *LAT* 的語種分類法，他如客語、南島語的分類基本上也是按照相同的原則進行。臺灣所有語言、方言的分類系統詳見 *LAT* 【附錄 2】「臺灣語種分類系統表」。這不是傳統的語種分類。

新的分類考慮到語言接觸所產生的變化，並作為次方言及二次方言的分類原則，因而使其分類系統相對複雜。這種把語言接觸放入語種分類的考慮突顯了「社會語言地理學」的特色。

### 3.2 語言區劃的語言社會學元素

把語言接觸和語言漸層性做為語言分類的考慮，同時也造成 *LAT* 語言區劃的複雜。由該書【附錄 3】「臺灣語種區劃系統表」可以窺見整個系統的全貌。這不是傳統的語言區劃。新型的語言區劃不但把語言的漸層變異做為次方言及二次方言的語言分類標準，又把語言使用的自主性、重疊性所造成的漸層分佈做為語言區劃的標準，因而使得語言區劃系統更加龐大而複雜。而這就是「社會語言地理學」語言不得不擔負的代價。

*LAT* 提出 6 個原則作為語種區劃的標準（詳參洪惟仁 2013a）。即：

- (1) 同質性原則：同語言區內的語種須具有內部的同質性與外部的異質性。
- (2) 共時性原則：畫入地圖上的資訊是現代的語種分佈實況，時間跨度限定在 2005 年至 2009 年之間。



- (3) 連續性原則：劃入同一語言區的語種分佈具有空間上或語言使用上密切的連續性關係。
- (4) 優勢原則：語言區標示的語種是根據統計或估計為優勢的語言。
- (5) 傳統原則：世居人口的傳統使用語言加權計算其重要性，儘量保留在傳統語言區。
- (6) 土地與人口平衡原則：語言區劃的設計考慮使各語言區的分佈空間大小和使用人口數儘量達到平衡。

以上 6 個原則中，前三個是傳統語言地圖所採用的，後三者是 *LAT* 獨創的。其中「優勢原則」考慮了語言社會學的意義，「傳統原則」考慮了歷史文化及語言社會學的意義，「土地與人口原則」考慮了人文地理學的意義，因此 *LAT* 繪製的地圖記載了比傳統語言地圖更豐富的資訊。它不只為語言學服務，也為其他的領域如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服務，因此更具實用價值。

和語言社會學直接相關的是「優勢原則」，間接相關的是「傳統原則」。這兩個原則具有相關性，而「傳統原則」的順位（*ranking*）甚至更高，可以否決「優勢原則」。茲說明如下。

### 3.2.1 優勢原則

臺灣沒有一個地方只有單一、純粹的族群或語言，幾乎任何地區都是混雜的，如果要把所有混雜的情形都標示出來，地圖就會顯得瑣碎而複雜，無法理解。因此語言混雜區必須訂出指標，作為在地圖上劃區、標示語種屬性的標準。

各地語言混雜的程度不一，*LAT* 以統計或估計使用人口的比例為劃區與標區標準：語言使用率或佔有率佔 60% 以上的空間標示為「優勢語言分佈區」；使用人口各為 30%~60% 之間的多語區劃歸為「混雜區」；不及 10%~30% 僅以「混雜點」或「語言點」符號標示其存在；不及 10% 的語言或方言原則上不特別標示。但零星散佈的少數民族聚落或稀有語種（如南島語部落、語言小島、平埔腔閩南語、鶴佬客閩南語、軍話、軍眷區）以語言點符號標示。

由本原則可知，*LAT* 的語種區劃採取「地理區本位」的語種區劃原則，考

慮的不止是語言如何分佈，更重要的是把空間的語言成份（如定性為優勢區或混雜區）、語言使用情形（如定性為單語優勢、雙語或多語混雜或雙語）等納入語言區劃的考慮，儘量在地圖上把臺灣語言空間的複雜性、多樣性充分標示出來。因此具有語言社會學的意義。

### 3.2.2 傳統原則

台灣四百年史，說穿了就是一部語言戰爭史（洪惟仁 1995）。語言戰爭至今都還不斷地進行。在戰爭的進行中，到底如何把語言地盤如實地反映在地圖上？

*LAT* 的「傳統原則」規定：某語種的傳統地盤，因近年強勢語言入侵變成混雜區而屈居弱勢，但傳統語言仍在家庭中使用，且老派仍使用傳統語言，整體保有 40% 以上的使用率，且其傳統地盤與鄰接的同質語言分佈區相連接，可按「連續性原則」及「傳統性原則」，認定為傳統地盤，劃入傳統語言區。

本文所提出的「傳統原則」不是在否定「共時原則」和「優勢原則」，只是對世居居民使用的語言或傳統方言加權計算其比重，以為歸州、歸區的標準，減少外來優勢的、共通語的擴張淹沒傳統語言存在的救濟原則，使得地圖能夠反映當代世居居民的、老年層的語言分佈狀態。這個原則有以下兩點需要說明。

#### 3.2.2.1 排除共通語與新社區混雜語

台灣語言史上有兩個最強勢的語言，一是閩南語，一是華語。如果完全依照「優勢原則」，那麼現在全台灣大半地區都應該劃入「華語區」。如果極端的按照「傳統原則」，那麼所有漢語都應該排除在地圖之外，畫出如四百年前的「南島語分佈圖」。而這顯然又和「共時原則」矛盾。

傳統語言和異質語種混雜區，如果按照「優勢原則」，把標準定為 50% 作為歸州、歸區的標準，傳統語言佔有率必須超過 50% 才能留在傳統語言區，如果不及 50%，必須劃入新入侵的優勢語言區。但如果按照「傳統原則」，把標準降為 40%，就可以把近年才屈居弱勢的傳統語言空間保留在其傳統語言區中。

根據以反映世居居民的、老年層的語言分佈狀態的「傳統原則」，以下兩

種語言必須先排除，一是作為共通語的華語，一是新社區的語言：

(1) 作為共通語的華語

華語，即所謂「國語」(national language)，算不算「臺灣語言」？臺灣絕大多數的人都會說華語。華語在臺灣已經存在了 70 年，經過長期強力而有效的「國語運動」，華語向下擴張，紮根社區、家庭，在都會區，甚至北部、東部的鄉鎮地區，其平均使用率已經接近一半或一半以上<sup>10</sup>，這樣一來，大半地區都可以根據「優勢原則」劃為「華語區」，「華語閩南語」或「華語客語」的混雜區。在可見的將來，華語可能取代本土語言的地位，成為臺灣實質上的本土語言，五十年至百年之間臺灣的語言地圖必然完全變色。但 *LAT* 並沒有將作為「國語」的優勢語言「華語」劃入地圖。其理由是：

1) 華語是入侵的語言，傳統本土語言尚存，並且還有相當的活力。目前華語的存在及其使用情形暫時歸入語言社會學的研究範疇，把華語當成是中國「標準語」(standard language) 的延伸或臺灣的「共通語」(lingua franca)，不加標示。這是一條基本原則，英語是國際共通語，在台灣也有相當的使用率，但也不作為 *LAT* 標示的內容。

2) 華語不佔有特定空間，不定在而無所不在，分佈在高階使用場合，在基層缺少空間的連續性，依照「連續性原則」，不加標示。

3) 華語的存在空間(社會空間或地理空間)幾乎是可以預測的，如果要詳細標示，則每一張地圖、每一個村落都得標示華語的存在，如此一來將使複雜的地圖更加雜亂。

但若為軍眷區、滇緬義胞，因為具有一定的分佈空間，其使用的華語、雲南話都標示為「優勢混雜區」或「語言島」的存在。不過近年眷村紛紛改建為國宅，變成混雜區，我們過去調查的眷村都消失了，原軍眷遷徙到哪裏，還沒有完整而確實的調查資料，本地圖集只能就我們所知，儘量標示，確實情形有待繼續調查。

<sup>10</sup> 根據筆者語言社會學的調查(洪惟仁 2004)桃園縣大部份的場合華語的使用率都遠比閩南語、客語大得多，總平均華語 55.46%，閩南語 25.83%，客語 10.84%，其他 8.38%。換言之，桃園縣已經有一半以上的場合聽不到本土語言了，按照「優勢原則」，桃園縣可以劃為「華語區」。

## (2) 新社區的語言

近半世紀以來，很多都會區或鄉鎮的新開發住宅區，因為都市化發展、工業區、住宅區的開發，遷入許多外來新移民，變成了「混雜區」。如臺北地區，雖然外來人口已經超過本地人數倍之多，傳統語言早已失去了「優勢」。但新移民與原居民混居，往往遷徙不定，還沒有培養出本土認同，其使用語種混雜，還沒有形成固定的語言或方言。五湖四海的新移民最認同的可能是「華語」，這從其里民大會使用的語言多半是華語就可以了解過半，而華語作為共通語已經被排除。*LAT* 根據「傳統原則」，暫不處理新社區的語言。

忽視以上兩種「優勢」的語言，使本地圖所顯示的，變成是世居居民的、老年的，語種屬性、分佈空間可以確定的傳統語種，公務場所的工作語言，新移民的語言或方言不標示在地圖上。

### 3.2.2.2 傳統語言片的歸區

除此之外，語言混雜區的弱勢的語言，只要老派的使用率超過 40%即可依「傳統原則」劃歸傳統語言區。舉三個實例說明如下：

#### (1) 中壢劃入客語區

中壢市南部大部份地區是客家人的傳統地盤，但是因為戰後內壢工業區的建立以及中壢市區的繁榮，吸引了大批閩南人移入，說混雜的閩南語。如今鐵路以北，幾乎是華語和閩南語的天下。根據洪惟仁（2004）的調查，中壢市閩南語的使用率是客語的 3 倍，和桃園市的情形差不多，只有在傳統市場，三語（華語、閩南語、客語）平分，完全看不出傳統的客語優勢，顯然本區的客語已經退入家庭。但是根據客委會 2004 及 2008 兩年的調查（楊文山 2004、2008），中壢市的客家單一認同分別是 49.4% 和 39.5%，平均將近 45%。筆者現居內壢，雖然在市場或街上很少聽到客語，但據我的訪問與觀察，客家人仍然在家庭中使用客語，本地的客家人見面仍然使用客語。估計中壢客語區的老派至少有還有 40% 的客語使用率。考量「傳統原則」及「連續性原則」，*LAT* 仍然把中壢劃入「客語州」，定名為「B1.1.1 中壢混合腔閩南語四縣客語混雜小片」（參見【圖例 8】「桃東四縣腔客語優勢區語言圖」）。不過中壢市的客語正在快速流失中，大部份中壢的客家青少年已經不會說客語了，反而閩南語更熟練，當然華

語是最熟練的語言，但華語視為共通語，不加標示。預測不久將來，鐵路以北，甚至鐵路以南，將淪為閩南語區，必須劃入「北閩州」。

### (2) 烏來劃入南島語區

烏來鄉原是一個純粹的泰雅族分佈區，講泰雅語 *Squliq* 方言。烏來自日治時代就已經是臺北地區最出名的風景區，溫泉旅館林立，但投資者及管理者及遊客主要是閩南人；另外烏來鄉孝義村是一個林場，留下的伐木工人及其後裔全部是閩南人。造成現在烏來鄉漢族佔了 58%，泰雅族只剩 42%，閩南語已經取得了優勢。按照「優勢原則」，烏來鄉應該劃入「北閩州」，但我們不這樣處理。根據人口統計，五個村中福山村泰雅族人口 82%，孝義村 0%，其餘三村 40% 至 43%。按「優勢原則」，烏來鄉只剩福山村夠資格劃入「南島語州」。但泰雅語人口超過 40% 的三村與福山村相連續，雖然漢人已經佔多數，但不是絕對多數。根據「傳統原則」及「連續性原則」，我們把三村劃入「南島語州」泰雅語區之下的「A1.1.2 烏來閩南語泰雅語混雜小片」；至於孝義村已經是閩南語絕對優勢了，只好劃入北閩州「C2.6 烏來孝義混合腔閩南語小片」（參見【圖例 9】「烏來鄉語言分佈圖」）。

### (3) 花東州的劃區

花東州大部份地區，尤其是市街附近村里幾乎都是漢語（閩南語、客語）的優勢區，但有很多村落是漢語和阿美語混雜區。這些混雜村究竟要劃入「G2 阿美語優勢區」或「G3 縱谷閩客阿美錯雜區」必須有個準則。我們的原則是：阿美族人口比例超過 40% 的村劃入 G2，不及 40% 劃入 G3。如關山鎮東部是閩南語與恆春阿美的混雜區，電光里阿美族佔 61%，屬於主要族群，自然劃入 G2 的阿美優勢區；其餘各村，德高里阿美族只佔 31%，新福里 30%，鄰鄉的鹿野鄉瑞源村阿美族佔 34%，均不及 40%，雖然緊鄰「G2 阿美語優勢區」，仍然劃入「G3 縱谷閩客阿美錯雜區」（參見【圖例 10】「花東州上南部語言地圖」）。花東州「G2 阿美語優勢區」或「G3 縱谷閩客阿美錯雜區」的交界地帶都是混雜區，其劃界、歸區都根據上述原則處理。

「傳統原則」只作為劃區與標區的變通原則，不影響混雜區的標示，讀者可以發現同一個小片內各村里語種代表色的色條有粗、有細，其粗細代表語種

分佈的比例，如 G3.3.8「池上閩客混雜小片」內各村閩客混雜比例都在 30%-60% 之間，但慶豐村和萬安村客語多於閩南語，所以客語色條比較粗，閩南語色條比較細，其餘各村閩南語多於客語，閩南語色條比客語粗。雖然混雜比例不同，並不影響劃為同一「混雜小片」。

為傳統語言加權計算其比重，優勢下限由 50% 調至 40% 作為劃區標準，對於「共時原則」和「優勢原則」只有小幅度的否決，整體影響還不太大。但把弱勢的傳統語言的比重加權計算，正如我們「優勢原則」的但書：「特別標示零星散佈的少數民族聚落或稀有語種」（參 3.2.3.1 節「優勢原則」）表現了我們對瀕危語言的關心一樣，表現了我們對弱勢語言的關心。

### 3.2.3 語言區劃的社會語言學說明

語言地圖集通常附有地圖的「說明」。「語種分類本位」的地圖因為關心的是語種的分佈，因此地圖說明也著重在本地圖的語種分佈及各語種的語言特色。「地理區本位」的語言地圖，如 *LAT* 除了語種分佈及語言特色的說明之外，還要說明地圖內各語種的互動關係、語種使用人口比例，語言使用情形等語言社會學關心的課題，同時交代了社會方言學分佈狀態、進行中的變化，而這是社會語言學關心的課題。

以下舉 *LAT* 三張地圖的說明，以見其社會地理語言學研究之一斑。如：

(1) 「B7.1.1 花東州上北部語言地圖」有關閩南語的說明中說：

陳淑娟 (2013) 對花蓮市閩南語做了詳細的社會方言學調查，發現老年層  $o=oo$  混同傾向並不明顯，〈刀高〉類尚有 85.5% 唸成  $o$ ，但隨著年齡下降，逐漸變成  $oo$ ，到青年層有 90% 唸成  $oo$ ，幾乎完成了  $o>oo$ 、 $o=oo$  混同的音變；至於陽入本調的變異，閉音節（韻尾 -p, -t, -k）以 -k 韻為例，老年層即以顯示 75% 中短調 [32]（本文的標示法為 [30]）的優勢，到青年層上升到 91%，幾乎全部混同於陰入本調（唯變調可分），但喉陽入（韻尾 -h）則以中平長調 [3]（本文的標示法為 [330]）為主流，喉塞音消失，與陽去混同。

## (2) 「B7.2 花東州中部語言地圖」有關客語的說明說：

對於花東縱谷的客家話調查最詳細的應屬呂嵩雁（2004, 2007），他認為後山幾個客家鄉鎮地區通行閩南話、客家話，客家人可以隨時變換使用，因此我們界定為雙方言區。這是從語種使用來看。但語種混雜必然帶來語言的混合。有關客語吸收閩南語的情形呂文列舉了一些實例：「音韻上受閩南語影響的例子，如：「肺」音 hi<sup>55</sup> (<fi<sup>55</sup>)，「淋水」（淋雨）lam<sup>11</sup>sui<sup>31</sup> (<lim<sup>11</sup>sui<sup>31</sup>) 是移借閩南語音，「紅」音 fong<sup>11</sup> (<fung<sup>11</sup>)，「公」、「工」音 kong<sup>13</sup> (<kung<sup>13</sup>)，「局」kiok (<khiuk) 發生了元音低化 ung>ong，是閩南語「通歸宕」(\*ung>ong) 的特色，古全濁音讀閩南語的不送氣音，也違反了客語的規律，這些是很大的變化。」

## (3) 「B1.3.15 達悟語區語言地圖」有關達悟語說明說：

蘭嶼達悟語和本島的各種南島語離得較遠，但內部方言相當一致，差異不大，較顯著的不同是除紅頭、漁人以外，其他的部落把 ai, aw 唸成 əy, əw (李壬癸 1999: 78)。根據何德華等 (Rau and Chang 2006) 的調查，複元音高化：ay>əy; aw>əw 是達悟語進行中的變化，椰油、東清甚至更進一步進行著 əy>i; əw>u 的演變。但詞頭 (pi-/ mi-/ ni-) 之後卻發生 i>əy; u>əw 的反向變化。

複元音高化現象雖然是各村普遍的傾向，但西南部紅頭村紅頭、漁人兩個部落顯示特別保守，統計複元音央化在口語中出現的機率：ay>əy：紅頭 (16.9%)、漁人 (17.1%)，都不及 2 成；野銀 (39.4%) 佔 4 成；其餘各部落，朗島 (72.1%)、東清 (78.4%)、椰油 (82.5%) 都超過 7 成。

至於 aw>əw，合併計算紅頭村（紅頭、漁人）佔 12.5%，其餘各村 79.6%。aw>əw 音變較 ay>əy 略顯落後，但紅頭村兩個部落都顯示特別保守，其餘各村即將完成。

以上有關社會語言學的說明，可見作者把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融入語言地理學的研究，體現了 *LAT* 「社會語言地理學」的研究旨趣。

### 3.3 方法論的檢討

世界上的語言地圖不少，能夠把語言社會學的元素融入地圖上的研究，雖然不能說沒有，其實的很罕見的。在我所知的範圍內，只見過一張地圖略有「社會語言地理學」的意義，即 Hattori (1981) (【圖例 11】「大太平洋地區漢語方言變種分佈圖」)。地圖上顯示漢語各方言在太平洋西岸各大城市的分佈，值得注意的是地圖的三角形符號不止標示著漢語集中分佈的城市位置，而且用不同的語言代表色標示著閩南語、粵語、客語或官話的方言類別，並且標示其次方言的人口比例。這不但具有漢語方言學的意義，也具有語言社會學的價值，並且具有三度空間立體地圖的意義。《中國語言地圖集》(1987) 圖 B16a-b 引用了這張地圖的內容，可是把它簡化了，只標示最優勢的方言，沒有次優勢方言，更沒有次方言的人口比例。這等於從「社會語言地理學」中刪除了「語言社會學」元素，同時也把三度空間的立體地圖壓成二度空間的平面地圖了。

*LAT* 是「社會語言地理學」初步的嘗試，因為目前臺灣只有這個研究例，只能以此為例來說明。我們在上文中交代了如何把社會語言學、語言社會學的元素融入語言分類、方言分類與語言區劃中，但在方法論上，仍可能有一些質疑，需要在此檢討一下：

(1) 關於語言分類科學性的質疑：語言區劃論往往被質疑是否具有「科學性」。因為語言地理區劃的前題是語種分類已有定論，如果語種分類受到質疑，連帶地語言地理區劃的可行性、可靠性也會受到質疑。目前臺灣的語種分類已經解決了嗎？如果沒有解決，那麼語言地理區劃的嘗試也可能白費力氣。日本就是一個例子。

戰後日本曾經有一段時間(1950年代及1960年代)，在東條操的領導下一度盛行「方言區劃論」，企圖為日本語方言進行分類與區劃，1964年為了紀念東條操傘壽(八十歲生日)，還編成《日本の方言区画》的論文集(日本方言研究會編東條操總監(1964))，可是書成之後，方言區劃論反而衰退了(馬瀨良雄等 2002: 34)，大西拓一郎(2011)總結其原因是：



- 1) 對如何區劃方言界線沒有明確的說法。
- 2) 根據何種語言要素劃區始終停留在探索階段, 停留在無休止的爭論中, 毫無結論。
- 3) 對於日本語整體的方言分類缺乏系統性研究。

總之因為日本方言學者檢討的結果, 認為方言分類缺少科學性, 所以「方言區劃論」衰退了。

不過在中國, 也許還沒有深刻檢討方言分類的「科學性」問題, 方言區劃卻方興未艾。1987年出版了《中國語言地圖集》, 2012年又出版了修正二版。關於漢語方言的分類, 兩個版本基本上相同, 只有細節的調整。熊正輝、張振興在二版說明〈A2 漢語方言的分區〉(2012:8-9) 對趙元任等的《中華民國新地圖・語言區域圖》(1934)起, 經過中央研究院《中國分省新圖・語言區域圖》(四版 1939, 五版 1948)到《中國語言地圖集》(初版 1987, 二版 2012)有關漢語方言分類法的演變做了簡要的說明, 但是我們看到的都是分類的結果, 其地圖說明也只是簡單的敘述各類方言的特徵, 有關方言分類的「科學性」論證付諸闕如。

臺灣的語言地圖濫觴於小川尚義(1907)的〈臺灣言語分布圖〉, 這是一張語言區劃圖, 但這張地圖其實是祖籍分佈圖, 因為作者混淆了閩粵祖籍與閩客語言的區別(洪惟仁 2014)。戰後發表的漢語分佈地圖不是根據小川(1907)的地圖改繪, 就是分類粗略, 而缺乏調查基礎。洪惟仁(1992)和張屏生(2007)根據自己不完整的調查繪製了新的地圖, 其分類系統和地圖精細度也都有改進的空間。

*LAT* 是根據最新的分類及語種分佈調查所繪製。不過儘管 *LAT* 對於方言分類的方法做了簡要的說明, 但只是例示性的, 作為其前提的分類系統的整體研究尚未完全發表, 同樣是未見科學的語言分類研究, 先見語言區劃地圖。這種不見開花, 只見結果的作法未免啟人主觀、武斷的質疑。

對於這樣的質疑我們沒有辯駁, 因為這的確是 *LAT* 研究上的限制。至今有關臺灣語種分類的研究成績還不是很嚴謹與完整的, 本研究只能儘其所能, 歸納現成所有的研究成果, 做適當的判斷, *LAT* 提出的「臺灣語種分類系統」。這

是囿於現實不得已的做法，適當與否還有討論的餘地。

但如果說只有嚴謹、科學的語種分類完成才能繪製語言地圖，那麼過去很多語言地圖是不是就沒有價值了呢？嚴謹、科學的語種分類要等到幾時才能出爐？如果永遠不能完成，那是不是意味著永遠不值得繪製語言區劃地圖？

任何學術研究的論斷都難免主觀，要避免主觀，必須有很多研究者進行研究，各自提出其主觀的意見，經過互相辯駁、互相印證，凝聚共識，提出一個「共同主觀」、「相對客觀」的結論，雖然只是暫時性的結論。但語言學界研究臺灣的語言是否已經得到共同的結論都值得懷疑，遑論臺灣各語種的方言學及方言地理學是語言學的邊緣學科，研究方言分類的更是鳳毛麟角，有關各語種的方言分類大概永遠不可能得到共同結論。因此我們只能說 *LAT* 只是階段性的成果，我們現在拋一個磚，期待能夠引出更多的玉，讓更多語言學家一起來建立更科學的臺灣語種分類。

(2) 關於語言調查精確度的質疑：我們的資料是怎麼取得的，有沒有每一個村里都做過語言社會學調查？如果沒有，*LAT* 的地圖有什麼根據能夠畫到村里，甚至聚落的精細度。我的回答是 *LAT* 採用的是「直接下鄉、間接觀察」。所謂「直接下鄉」並非直接下鄉去親耳聽取鄉民或村民說話或進行語言社會學的調查，而是下鄉訪問熟悉方言使用的本地人，包括鄉鎮長、民政課、戶政事務所、警察派出所、村長、村幹事、鄉鎮民代表或地方耆老、地方文史工作者、廟祝、神父、牧師，他們長期參與地方事務，對地方的語言、方言分佈相當熟悉。他們提供的語種使用訊息，雖然不如語言社會學的調查或家戶普查精密，也可以達到相當正確的程度。從 2004 年以來，我們就一直針對上述人物進行訪問調查工作。因為是間接了解地方語言使用的觀察法，所以叫做「間接觀察」。

如果這樣的方法不科學，怎麼樣才能做得「科學」？理想的說，應該進行全國性的語種使用普查，然後進行統計、分析，根據數據，進行語言分佈的空間區劃研究，才能繪製精細的地圖，可惜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採用過這樣的方法。1905 年及 1915 年臺灣總督府就做過臺灣居民的語種使用調查，但沒有繪製地圖，至今還沒有人利用來研究當時的社會語言地理學實況，其原因是語種分類太粗（只分福建語、廣東語、蕃語、國語（即日語）及其他外國語），統計

的行政單位太大(廳,約當於民國時代的縣),對於我們想知道的語言地理分佈細節,幾乎沒有利用價值。實際上分類精細的語言調查不可能透過官方的人口普查來進行。目前我們所能採用作為參考的官方調查資料是內政部的人口統計資料,原住民委員會的語種使用普查資料,客家委員會(2004、2008)兩次以鄉鎮為單位的族群認同調查報告,但這些都不是語言使用調查。

學界的語言社會學調查報告有一些,都是區域性的,並且都是抽樣調查,不是普查。從地域的角度看,語言分佈鄭錦全團隊對於新竹新豐鄉、雲林崙背、後龍、南庄等地的家戶語言使用調查是目前所見最精細的語言地理學研究,提供 *LAT* 重要的參考依據。但其調查,客語方言分類相當細,即使使用人口很少的方言也會紀錄,但閩南語卻不分漳、泉方言,顯然有失平衡,因此缺漏的資訊必須依據我們下鄉調查的紀錄來確認。

再說,語言地理學調查,無論怎麼精細都是有限的。就家戶調查來說,只在鄉村比較有效,在市區一定不能夠滿足嚴格的要求。如一棟樓幾十、甚至幾百戶,哪一戶說什麼話,在地圖上怎麼標示?至於一個家庭內同輩或不同輩使用語言的差異,在地圖上怎麼標示?如果我們只調查其中一人或一戶,就會發生代表性問題。事實上語言地理學是有限制的,過渡精細的調查已經超出語言地理學的領域,應該歸入社會語言學來研究。社會語言學也不一定要求要做到家戶、個人的語言使用,通常是以一個言語社區為單位,進行階層化的分析與統計。

我們採用「直接下鄉、間接觀察」的方法雖然不如語言社會學的調查或家戶普查精密,所得結果和其他更精細的調查所得的結果比較,在細節地方容有差異,但整體的傾向差不多。差異是正常現象,即使是同為社會語言學或語言社會學調查,不同的調查所得數據都會不同,但通常所顯示的「傾向」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其中必有問題。因此我們重視的是「傾向」,而不是絕對的數據。我們甚至認為所有的語言研究、乃至所有的社會科學所能確定的都只是一種「傾向」,而不是絕對的數據。

我們承認我們所採用的調查方法不是最精密的,但語言地理學研究所需的人力、經費、時間都很龐大,我們調查的範圍涵蓋整個臺灣,精細度達到村里

以下，如果調查太精細，調查的時程拖太久，比如三十年、五十年或甚至一百年才能完成，研究區的語言分佈一面被調查，一面在變化，時間因素和空間因素就會發生混淆，反而不能有確定的調查成果。語言具有變動性，語言分佈狀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語言地理學家繪製語言地圖，等於是為一群飛鳥做素描，要達到準確的困難度相當高。*LAT* 的調查工作主要在 2004 到 2009 年間進行，調查人力幾乎只有作者一人，全國所有的市鄉鎮走透透，調查訪問、資料分析、文獻核對、地圖不斷試繪、修改、重繪，加上理論的闡述、地圖說明，又經過五、六年，總共花費了十年以上的時間。在各種主、客觀的限制下，*LAT* 只能以現在這個面貌呈現給讀者了。我們還是認為 *LAT* 只是階段性的成果，拋磚引玉，希望更多語言學家一起來建立更科學的臺灣語種分佈調查、語言區劃與地圖繪製。

但我必須強調，「社會語言地理學」裡的「語言社會學」都不是完整的語言社會學調查，只是選取其部分成份，摻入語言地理學研究。如果要求完整的、而且是正規的語言社會學調查，這樣語言社會學調查必須單獨進行。但是臺灣這麼大的地區，也不可能全部進行，否則即使傾全國語言學家之力，要完成所有村里的語言社會學調查，所需時間恐怕不止一百年，即使一百年能夠完成，共時研究和歷史變化也會發生混淆，不是合理可行的做法。

#### 4. 結論

社會語言學和地理語言學本來是各自獨立而不相干的研究領域，把社會語言學的元素融入地理語言學研究，就可以說是「社會地理語言學」。本文採用「地理語言學」與「語言地理學」分科的主張，因此「社會地理語言學」可以細分為「社會地理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地理學」兩個分科。

第二節評介臺灣的社會地理語言學研究成果，分為「社會地理語言學現象呈現」及「社會地理語言學分析研究」兩類簡介其研究成果。前者以呈現社會地理語言學現象為目的，一開始就把社會語言學的元素（特別是年齡層因素）融入地理語言學研究中。後者以解釋社會地理語言學現象為目的，社會語言學和地理語言學先分別進行，各自進行獨立而完整的調查，然後再根據主題需要，

剪裁語料，進行分析與解釋。「社會地理語言學」的研究都只將「年齡」的元素融入地理語言學中，進行「表面時間的比較」，還沒有見到將其他元素如職業、性別等融入研究的嘗試。

第三節簡介「社會語言地理學」如何將語言社會學的元素（如語言使用）融入語言地理學的研究。分別介紹如何進行語言分類與語言區劃。本文以洪惟仁撰寫中的《臺灣語言地圖集》為例，探討如何將語言使用的漸層變化與漸層分佈的概念融入語言分類與語言區劃的操作中。因此將其研究定性為「社會語言地理學」的研究，最後並提出在方法論上有關語言分類科學性及語言調查精確度可能的質疑，並針對質疑提出其解釋。

## 引用文獻

- Brewer, Warren A. (卜溫仁) 2008. *Mapping Taiwa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A17.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c Sinica, Taipei, Taiwan.
- Chambers, J. K. and P. Trudgill. 1998. *Dialectology*. 2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ttori, Shiro (服部四郎). 1981. Distribution of varieties of Chinese in the Greater Pacific Area, *Language Atlas of the Pacific Area*, eds. by Wurm, S. A. and Shiro Hattori, 47. Canberra: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 Labov, William, Sharon Ash and Charles Boberg. 2006. *The Atlas of North American English Phonetics, Phonology and Sound Change: A Multimedia Reference Tool*.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Rau, D. Victoria (何德華) and Hui-Huan Ann Chang (張惠環). 2006. Phonological variation and sound change in Yami on Orchid Island. *Streams Converging into an Ocean: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Paul Jen-kuei Li on his 70th Birthday*, eds. by Henry Y. Chang, Lillian M. Huang, and Dah-an Ho, 393-413.

-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W-5.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c Sinica, Taipei, Taiwan.
- Wurm, S. A. and Shiro Hattori (eds.) 1981-1983. *Language Atlas of the Pacific Area*. Canberra: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 グロタース (Grotaers, Willem A.、賀登崧). 1969. 〈最近の欧米における方言研究〉, 平井昌夫、徳川宗賢編《方言研究のすべて》, 101-109。東京: 至文堂。
- 小川尚義 (主編). 1907. 〈臺灣言語分布圖〉,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日臺大辭典》附頁。臺北: 臺灣總督府。
- 大西拓一郎. 2011. 〈語言地理學的研究目標是什麼?〉 (日文原題〈言語地理学は何をめざすか?〉), 《語言教學與研究》5: 40-46, 北京語言大學。又收入曹志耘主編《漢語方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2013:1-12)。
- 中央研究院. 1939. 《中國分省新圖・語言區域圖》(四版), 14。上海: 申報館。  
\_\_\_\_\_. 1948. 《中國分省新圖・語言區域圖》(五版), 14。上海: 申報館。
- 中國社會科學院與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 (編). 1987. 《中國語言地圖集》(Language Atlas of China)。香港: 朗文書局。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所與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編). 2012. 《中國語言地圖集第二版・漢語方言卷》(Language Atlas of China)。北京: 商務印書館。
- 日本方言研究會編、東條操總監. 1964. 《日本の方言区画》。東京: 東京堂出版。
- 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 1966-1974. 《日本言語地図》。東京: 大藏省印刷局。
- 何正芳. 2011. 《澎湖縣湖西腔閩南語在地理和年齡的變化研究—以《彙音妙悟》「高」、「科」韻和小稱詞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呂嵩雁. 2004. 〈台灣客家話的語言接觸現象〉, 《花蓮師院學報》18:1-23。  
\_\_\_\_\_. 2007. 《臺灣後山客語的語言接觸現象》。臺北: 蘭臺出版社。
- 李壬癸. 1999. 《臺灣原住民史: 語言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 李仲民. 2009. 《從地理語言學論臺灣閩南語語言地圖的編製觀念與方法—以臺灣東北部閩南語研究為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_\_\_\_\_. 2011. 〈Glottogram 在地理語言學研究的一個實例〉，《語言教學與研究》5: 40-46。北京語言大學。又收入曹志耘（編）。2013. 《漢語方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167-175。
- \_\_\_\_\_. 2014. 《地理語言學的實踐》。台中：一切智智國際文創有限公司。
- 柳田國男. 1930. 《蝸牛考》。東京：刀江書院。
- 洪惟仁. 1992. 《臺灣方言之旅》。台北：前衛出版社。
- \_\_\_\_\_. 1995. 〈臺灣的語言戰爭及戰略分析〉，許俊雅編《第一屆臺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一屆臺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119-158。臺北：國立師範大學
- \_\_\_\_\_. 2003.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臺灣普通腔的形成》，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 \_\_\_\_\_. 2004. 〈世紀初桃園語言社會學調查報告〉，《臺灣語文研究》2: 99-124。
- \_\_\_\_\_. 2005. 〈從兩個時期製作的方言地圖看臺灣閩南語的變化〉，福州師範大學：第九屆閩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 \_\_\_\_\_. 2009. 〈臺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臺灣語文研究》3: 239-309。
- \_\_\_\_\_. 2013a. 〈臺灣的語種分佈與分區〉，《語言暨語言學》14.2: 313-367。
- \_\_\_\_\_. 2013b. 〈閩南語入字頭(日母)的音變潮流〉，《臺灣語文研究》7.2: 1-33。
- \_\_\_\_\_. 2014. 〈族群地圖與語言地圖的史實鑑定：從小川地圖（1907）說起〉，《臺灣語文研究》8.2: 1-34。
- \_\_\_\_\_. 2015. 〈語言分佈發展的擴散論與類型論〉，《語言暨語言學》16.5: 639-660。
- \_\_\_\_\_. 2017（預定）。《臺灣語言地圖集》。台北：前衛出版社。
- 洪惟仁、簡秀梅. 2012. 〈關廟方言群島「出歸時」現象的漸層分佈：漳泉方言的競爭與重整〉，鄭錦全編《語言時空變異微觀》，173-210。《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四十九。

- 柴田武. 1969. 《言語地理学の方法》。東京：筑摩書房。
- 馬瀨良雄監修，佐藤亮一、小林隆、大西拓一郎編集. 2002. 《方言地理学の課題》。東京：明治書院。
- 涂文欽. 2009. 《彰化縣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_\_\_\_\_ . 2011. 〈彰化縣閩南語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臺灣語文研究》6.2: 111-145。
- 真田信治. 1985. 〈社会方言学と方言〉，加藤正信編《新しい方言研究》，114-131。東京：至文堂。
- \_\_\_\_\_ . 1990. 《地域言語の社会言語学的研究》。大阪：和泉書院。
- \_\_\_\_\_ . 2002. 〈社会方言地理学の実践：グロットグラム小史〉，馬瀨良雄監修《方言地理学の課題》，345-356。東京：明治書院。
- 張屏生. 2007. 〈臺灣地區漢語方言分布〉，《臺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冊一，386-393。臺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張素蓉. 2006. 《臺中縣海線地區泉州腔的漸層分布》，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素蓉、洪惟仁. 2007. 〈臺中縣海線地區泉州腔的漸層分布：一個社會地理方言學的研究〉，王旭、徐富美主編《社會語言學與功能語法論文集》，13-43。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陳昭蓉. 2005. 《澎湖縣湖西鄉閩南語語音變異之研究》，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淑娟. 1995. 《關廟方言「出歸時」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_\_\_\_\_ . 2013. 〈臺灣花蓮閩南語元音系統及陽入原調的變異〉，第13屆閩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福建泉州：泉州師範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學科。
- 趙元任等. 1934. 《中華民國新地圖・語言區域圖》。上海：申報館。
- 熊正輝、張振興. 2012. 〈A2 漢語方言的分區〉，中國社會科學院與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中國語言地圖集》，8-14。香港：朗文書局。



- 德川宗賢. 1993. 《方言地理學の展開》。東京：ひつじ書房。
- 潘科元. 1996. 《大臺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國立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文山（主持）. 2004. 《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印。
- \_\_\_\_\_. 2008. 《97年度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印。
- 鍾露昇. 1967. 《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研究報告。
- 簡秀梅. 2006. 《關廟方言區「出歸時」字類回頭演變之地理與社會方言學研究》，高雄師範大學臺灣語言及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簡秀梅、洪惟仁. 2008. 關廟方言區「出歸時」回頭演變之社會方言學研究》，王旭、徐富美主編《社會語言學與功能語言論文集》，45-66。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顧百里（Kubler, Cornelius C.）. 1978. 《澎湖群島方言調查》，臺灣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 黃謙. 1800. 《彙音妙悟》，《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臺北：武陵出版社影印。

---

洪惟仁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退休教授

[anguijin@gmail.com](mailto:anguijin@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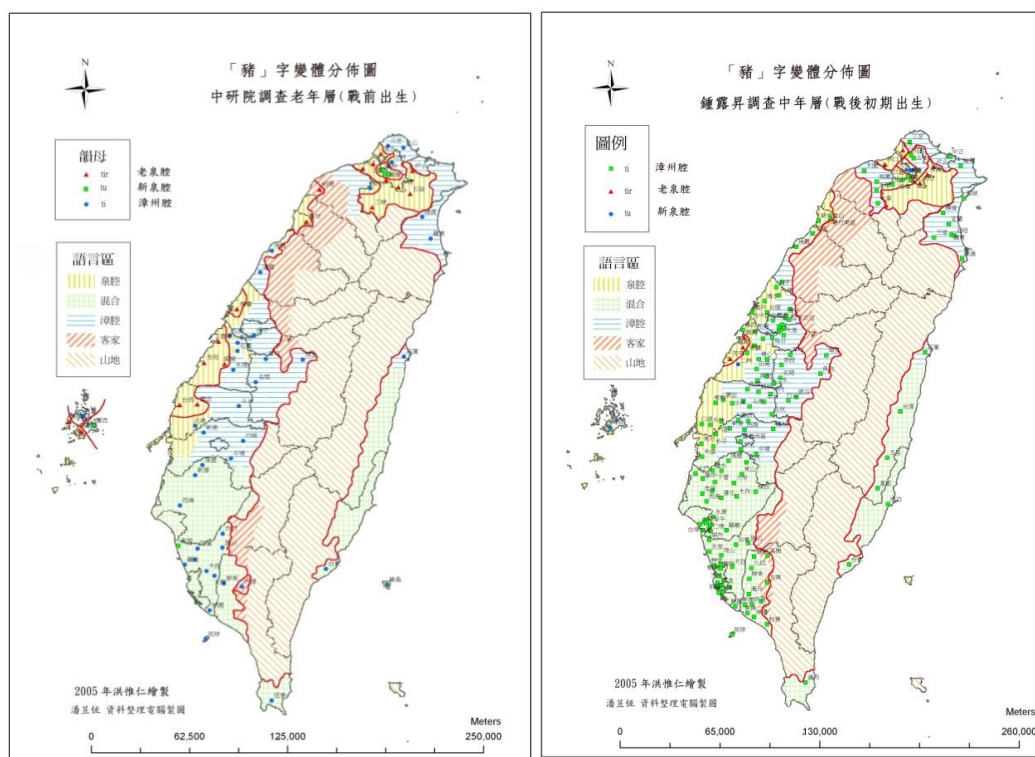
## **Social Geolinguistics in Taiwan and its Theories**

Uijin ANG

This paper not only claims that the so-called ‘geolinguistic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sub-branches, geo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geography, but also advocates that the factors of sociolinguistics should be involved in geolinguistics, so as to set up ‘social geolinguistics.’ The study introduces this very newly-emerging research trend in Taiwan, and discusses its methodology. After reviewing the six studies of ‘social geolinguistics,’ we propose eight points of criticism on methodology. Then it focuses on the methods of ‘sociolinguistic geography’, and introduces how the *Language Atlas of Taiwan (LAT)* integrates elements of linguistic sociology into both the language categor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The study ends with reflections and explanations for two possible criticisms which question the validity of this new approa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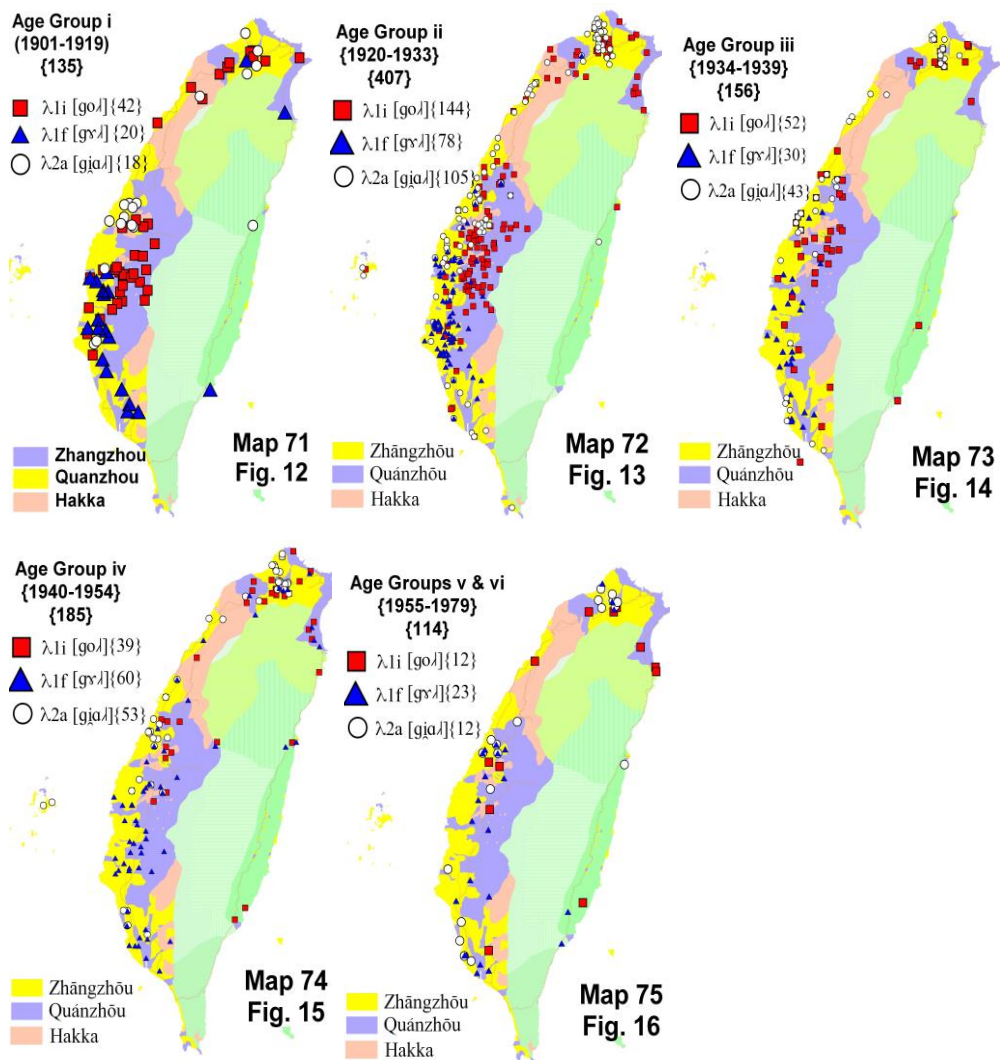
**Key words:** geolinguistics, sociolinguistic geography, language distribution, language categorization, language regionalization, language atlas.

【圖例 1】兩個世代「『豬』變體分佈圖的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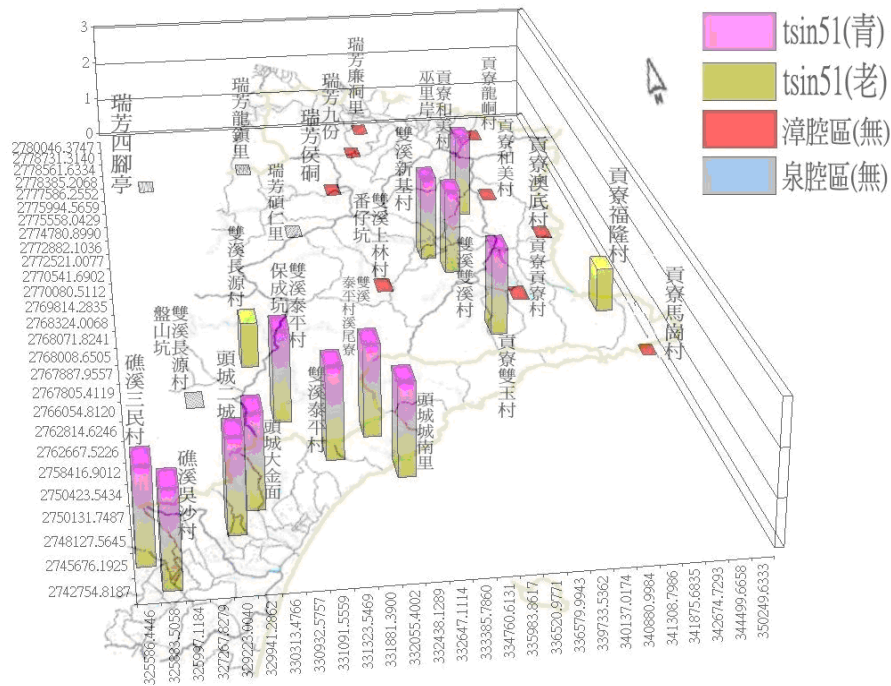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左圖根據中央研究院龔煌城「臺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1989-1996)的調查語料，代表戰前出生的老年層；右圖根據鍾露昇《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1967)，代表戰後出生的中年層，兩張地圖均為洪惟仁繪製或重繪。原載〈從兩個時期製作的方言地圖看臺灣閩南語的變化〉(洪惟仁 2005)

【圖例 2】「鵝」變體年齡分佈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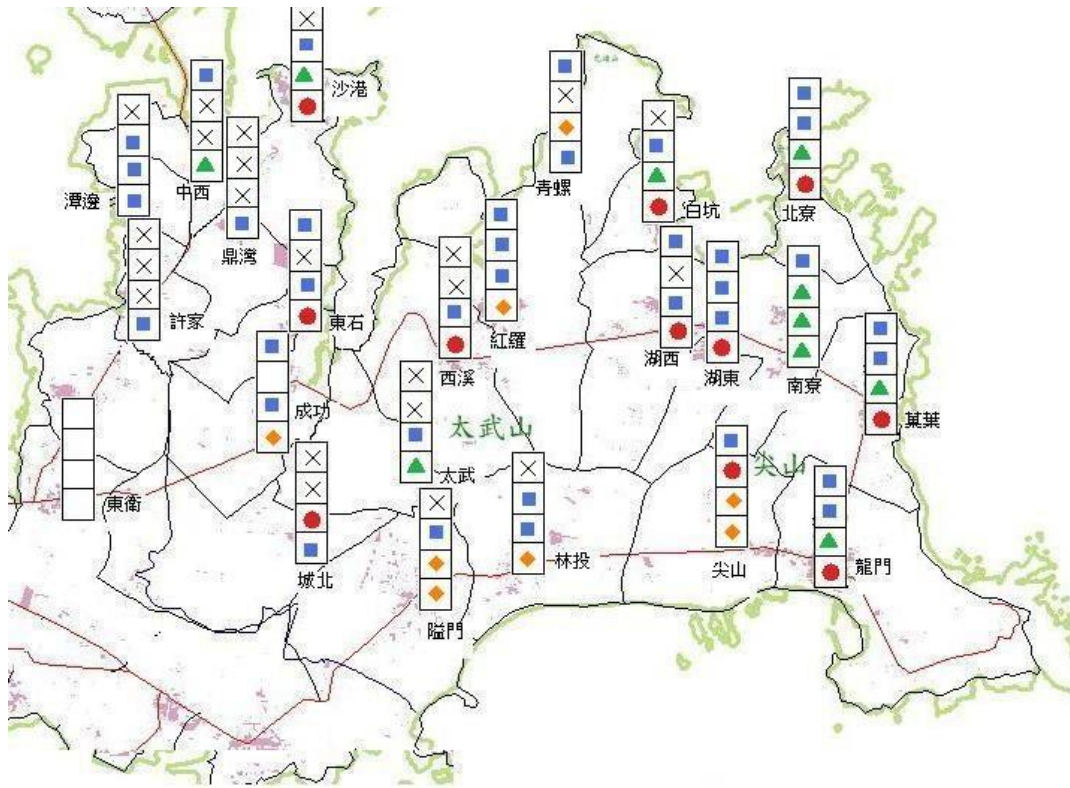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Mapping Taiwanese (Warren A. Brewer 2008:232-233)。

【圖例 3】臺灣東北部程度副詞傳統形式 tsin<sup>41</sup> 分佈圖



資料來源：引自李仲民博士論文(2009:204)「臺灣東北部程度副詞/tsin44/(真)、/tsin41/(盡)三維圖表」(圖 7.2.4)。宜蘭表「非常」義的副詞傳統形式是[tsin<sub>41</sub>]，相當於普通腔的[tsin<sub>33</sub>]。年齡曾分為老、青兩層，地圖顯示東北海岸由北邊開始向普通腔靠攏(唸 tsin<sub>33</sub>)，過渡區的青年層也已變化，只有宜蘭縣及貢寮、雙溪的核心區老、青都還保存著舊音(tsin<sub>41</sub>)的漸層分佈狀態。此圖因為套疊了二度空間地圖而加上時間的因素，是略過三度空間、虛擬四度空間的「立體地圖」，可以說是台灣社會地理方言學四度空間「立體地圖」的濫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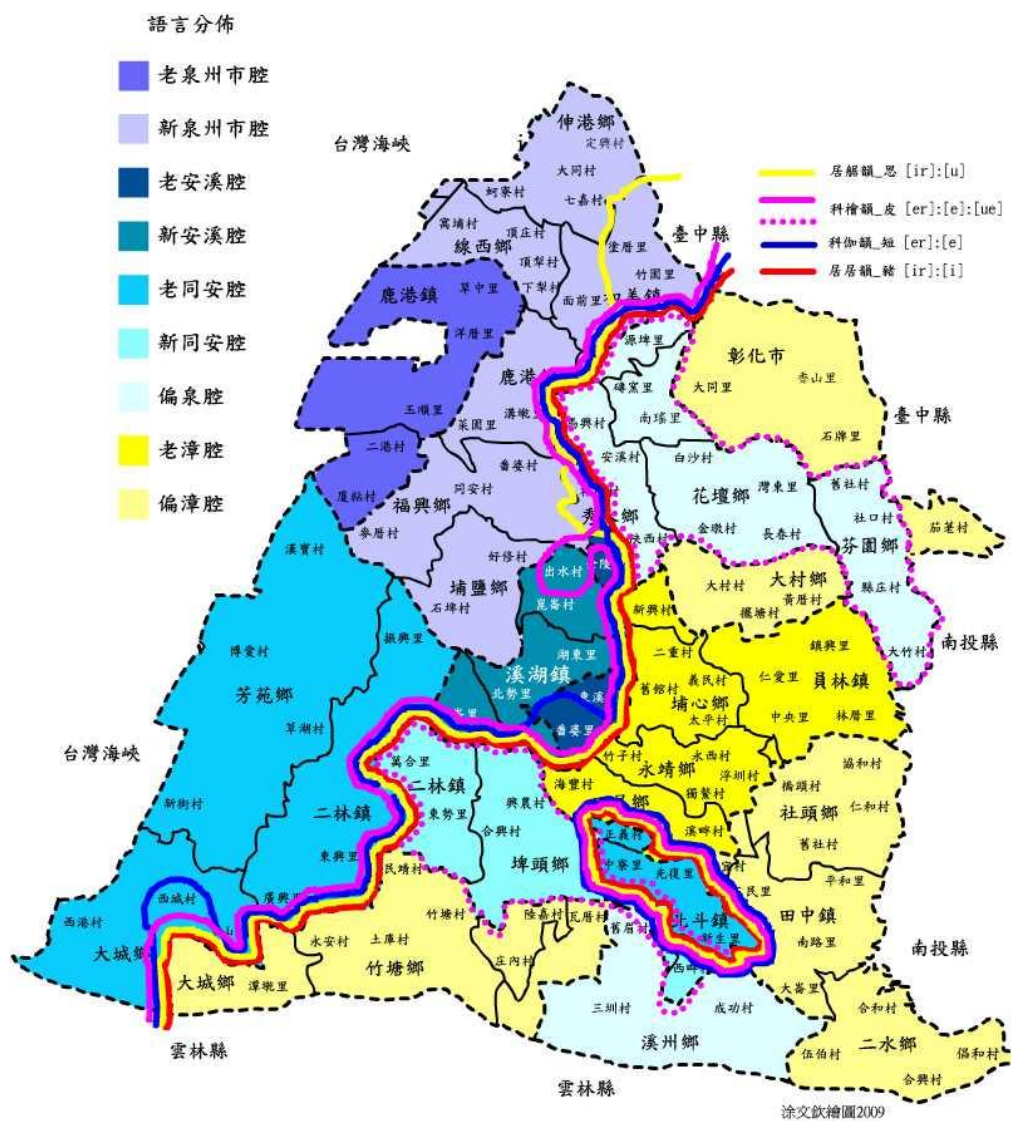
【圖例 4】澎湖縣湖西鄉傳統 io 讀社會地理方言分佈圖



資料來源：引自何正芳 2010:69，圖 5-1。圖中每村分四格，由下而上標示老、中、青、少四個年齡層的传统變體保守度。保守度依 39 字例中保存湖西方言傳統 io 讀的字數指數化分成 5 階：高度 30~39 以紅色●表示；中高度 20~29 以橙色的◆表示；中低度 10~19 以綠色的▲表示；低度 1~9 以■表示；零度 0 以x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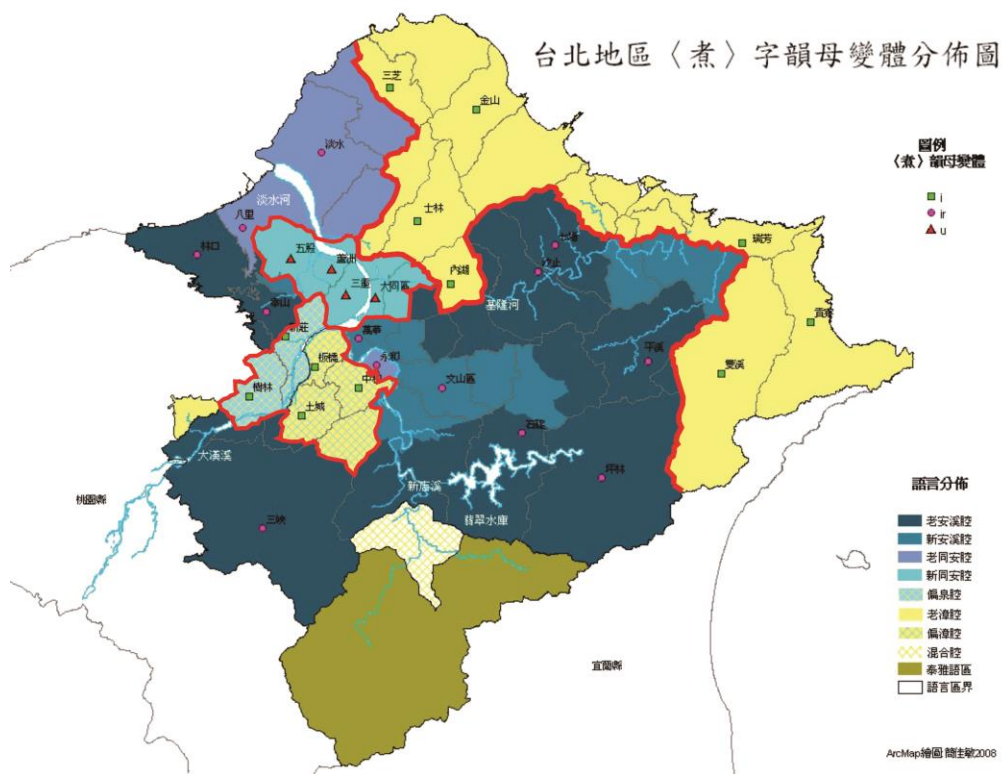
【圖例 5】彰化縣央元音字類變體等語線束圖

<單元音央元音類>等語線束圖



資料來源：塗文欽〈彰化縣閩南語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2011:118)。地圖背景的底色顯示作者的方言區劃，深冷色區塊的顏色由深而淺代表老泉山腔區、老泉中腔區和老同安腔區。黃色區塊代表漳腔區。

【圖例 6】臺北地區閩南語的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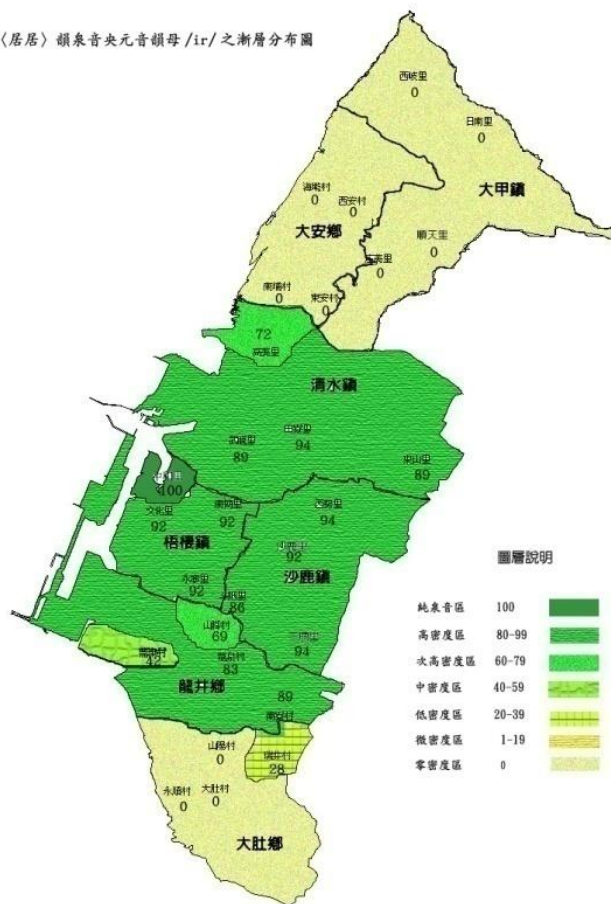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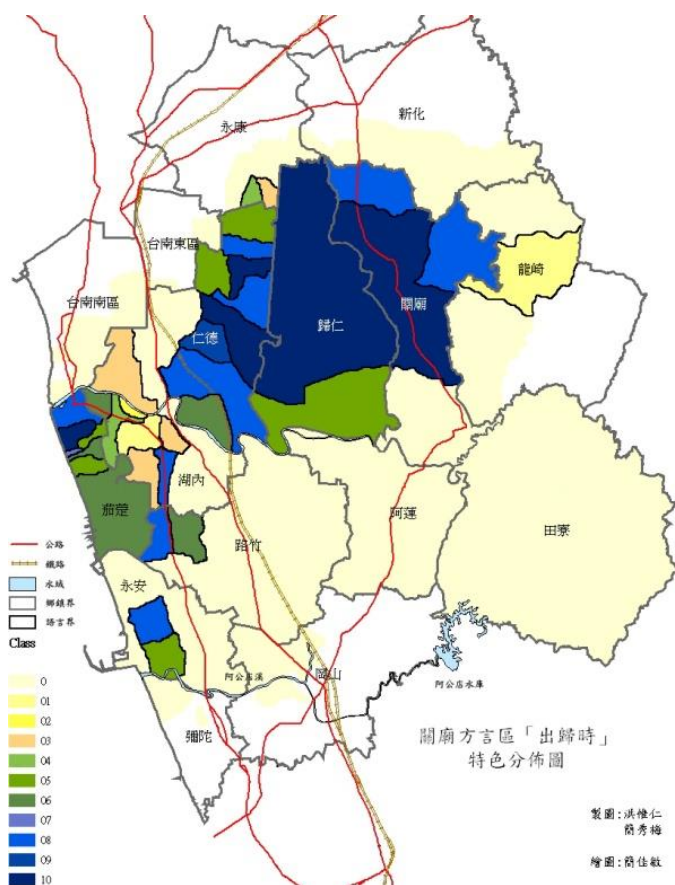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洪惟仁〈臺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2009)〈煮〉字的變體分佈圖，等語線加工



【圖例 7】 閩南語方言變體分佈的「方言等高線」地圖

〈居居〉韻母央元音韻母 /ir/ 之漸層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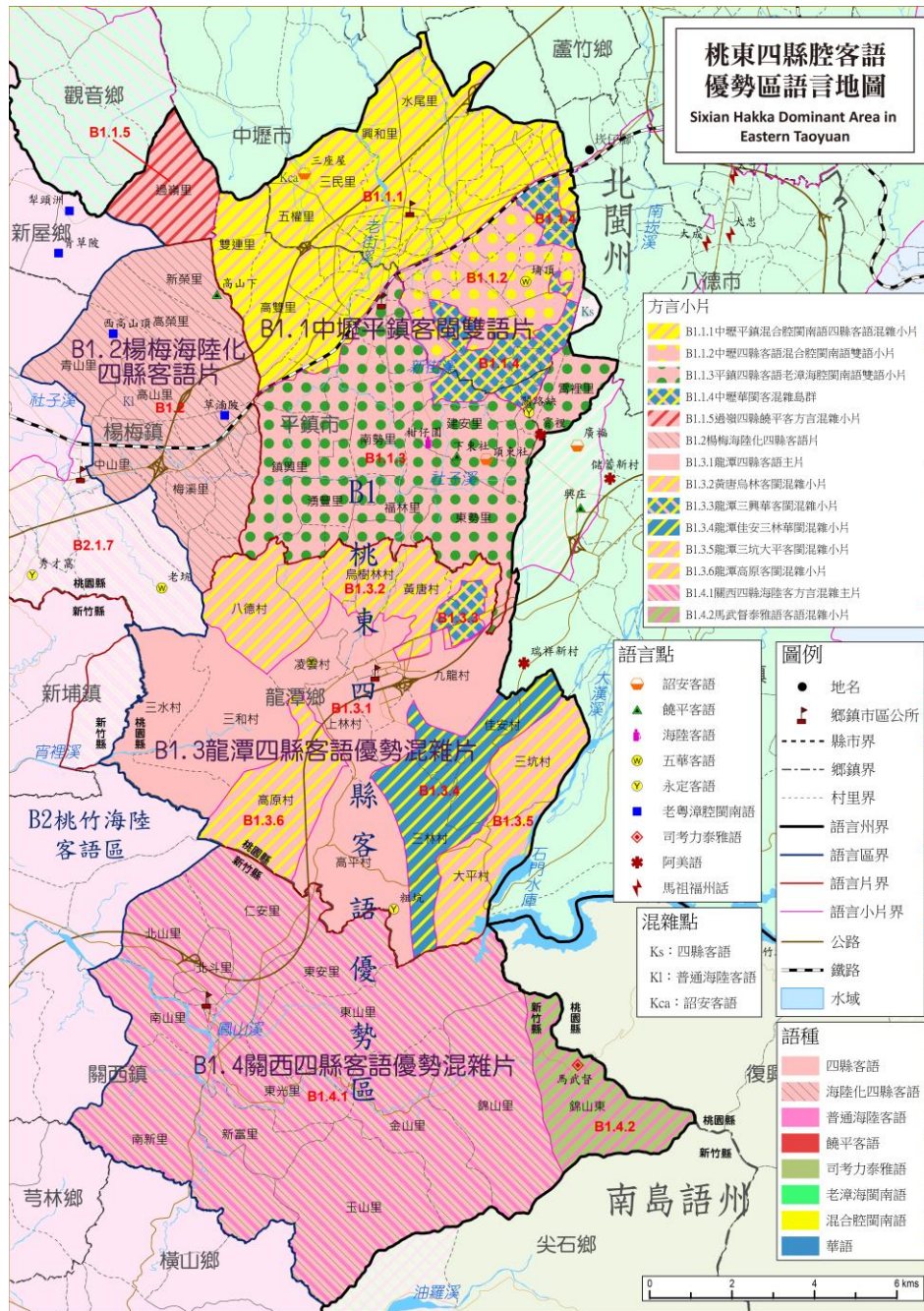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左圖引自張素蓉碩士論文《臺中縣海線地區泉州腔的漸層分布》

(2006)；右圖引自簡秀梅碩士論文《關廟方言區「出歸時」字類回頭演變之地理與社會方言學研究》(2006)。這種地圖能夠顯示方言的漸層分佈，同時也顯示方言的漸層變化，這是「方言等高線地圖」的初步嘗試，可以說是以二度空間地圖虛擬三度空間的「立體地圖」的濫觴。

【圖例 8】桃東四縣腔客語優勢區語言圖



資料來源：《臺灣語言地圖集》圖 B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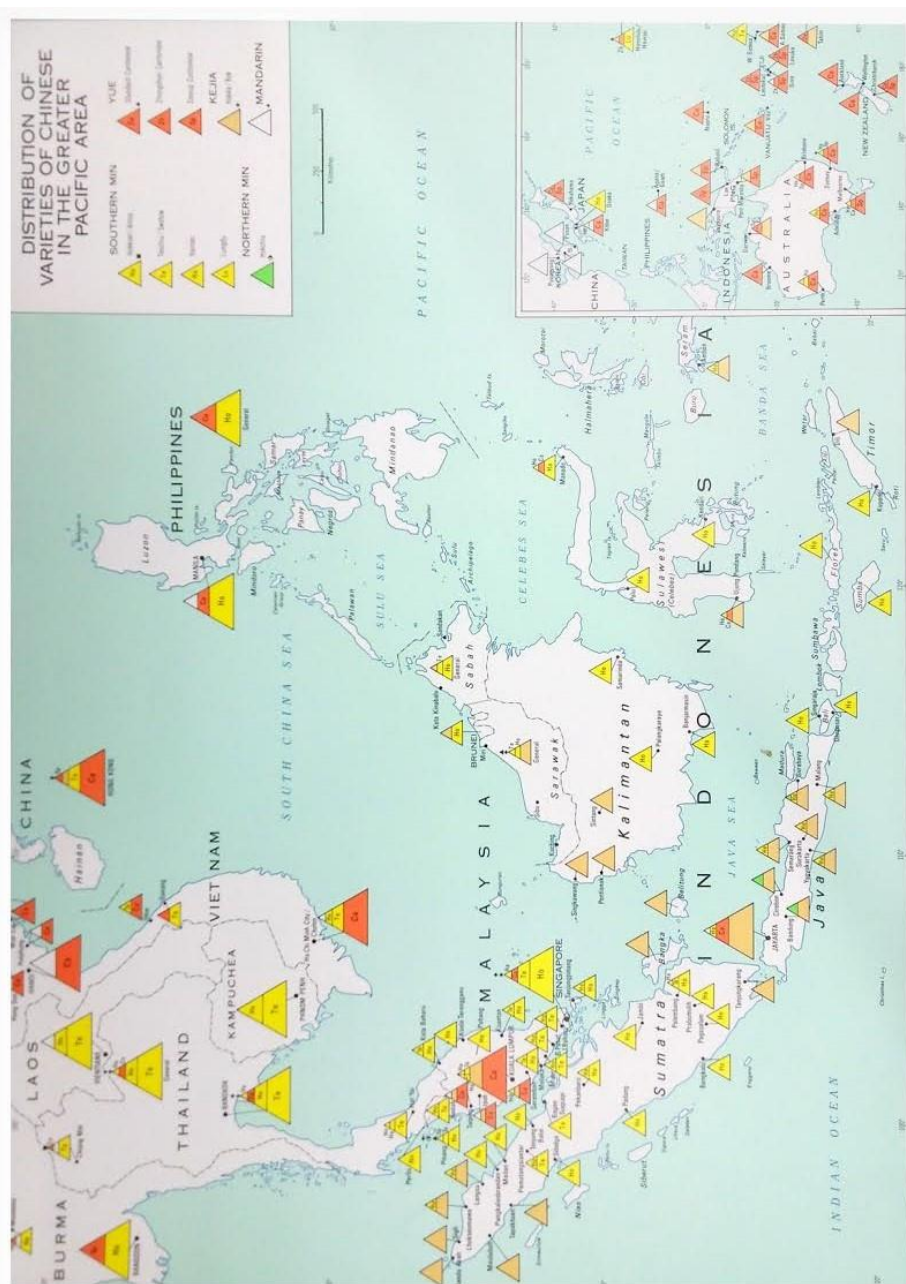
【圖例 9】臺北縣烏來鄉語言分佈圖



資料來源：《臺灣語言地圖集》圖 C1.1.1。



【圖例 11】大太平洋地區漢語方言變種分佈圖



From: Distribution of Varieties of Chinese in the Greater Pacific Area, *Language Atlas of the Pacific Area*, eds. by Wurm, S. A. & Shiro Hattori. (1981-1983:47)